

研究論文

考古人類學刊・第 94 期・頁 89-144・2021

DOI: 10.6152/jaa.202106_(94).0003

從南亞到法國：當代流亡藏人的跨國再遷徙

劉堉珊*

摘 要

本研究歷經兩年多，聚焦最近二十年經南亞（印度、尼泊爾）直接或輾轉移居至法國的藏人難民／流亡藏人（Tibetan refugees），目的在理解當代藏人自南亞向其他社會遷移的現象，及其在法國「安身」（settling in）過程中身分的轉變與不同階段人群關係的建立及延伸。文中透過不同個人對移動與離散經驗的敘事，呈現既固著於生活日常、又嵌合於大環境的生命經驗與身分描述，從中探討「移動」所串連起的人、事、時、地，如何成為意義化個人生命與社群認同的語彙及概念，希望由此更深入理解鑲嵌於「移動」與「離散」過程中各種界線的移轉與跨越，以及因社會情境變動而更加複雜與流動的社群經驗。透過這個新的民族誌案例，本研究期待以一個跳脫南亞脈絡、更具全球性的視野，檢視當代藏人社群流動與跨國遷徙的現象，並試圖理解時代更迭、世代延展與跨域的社會文化經歷，如何影響（及重構）不同個人對自我生命經驗與認同的認知與陳述。

關鍵詞：藏人難民／流亡藏人，跨國遷移，庇護，法國，南亞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Email: ysliu@mail.ncnu.edu.tw。

From South Asia to France: The Transnational (Re)migration of Tibetan Refugees

Yu-shan Liu*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igration flows of Tibetan refugees from South Asia, where they or their parents first settled after fleeing Tibet, to Franc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Based on the fieldwork carried out in both France and India between 2016 and 2019, this study casts light on the daily lives of Tibetans living in France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t explores how the Tibetan refugees engage with an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and mobile world of diaspora, and how they negotiate their identities (being stateless and being Tibetan) with different “others.” Focusing on the Tibetan newcomers in France, this study observes the dynamics enacted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ibetans of different origins. It also explores the ambiguities that are played out and reflected in assertions about being “Tibetan refuge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recent migratory flows of young people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bringing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from within and outside diasporic Tibetan communities, and thereby renegotiating the boundaries of “being Tibetan” and “being refugees.” Overall,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ignificant and insightful ethnography of the Tibetan diaspora today, and rethinks the anthropological methodology for dealing with people “on the move.”

Keywords: Tibetan refugee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sylum, France, South Asia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Email: ysliu@mail.ncnu.edu.tw.

一、前言

筆者從 2007 至 2009 年進入印度流亡藏人屯墾區 (settlement) 進行博士論文田野開始，即注意到藏人社會中的跨國 (再) 遷移現象。筆者發現，許多流亡至尼泊爾或印度的藏人，除了透過歐美國家的「專案接濟」分批、分梯次地往南亞之外再移動，續留在南亞者，相當多人的下一代亦不斷透過各種經濟與社會關係，前往歐、美等國家。從這樣的現象及部分移動者家人的言談中，筆者逐漸發現，後者那些看似自發、分散與個人的跨國移動，似乎已經成為許多出生於南亞流亡社會的年輕藏人，以及部分新流亡者，為自己與下一代尋找「更好的生活」(a better life) 的重要目標。

為了追尋向外移居藏人更具體的生活樣貌，筆者在熟識報導人的協助下，於 2016 年 6 至 7 月間，透過到歐洲參加藏學年會的機會，至法國大巴黎地區 (Île-de-France) 幾個移居藏人家庭進行了約一個月的先行性調查。¹ 在該次田野中，筆者發現，歐盟在近幾年透過《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逐漸取消成員國間邊境檢查的趨勢，不但使人群在歐洲內陸的流動更容易，也使其成為許多南亞藏人向外移動的首選，除了就學、婚姻與工作等途徑，部分藏人則是透過先進入東歐或南歐，再移動到難民認定與接收政策較「友善」之國家，如法國。

這些在近二十年移居至歐洲的藏人，包括在印度出生的流亡第二與第三代，以及近期逃往印度的流亡第一代。筆者發現，幾位受訪者在講述其移動經驗時，常會以「藏人」(bod pa, Tibetans) 作為一個特殊群體來描述其看似比其他「有國家者」更容易被接納、或更寬容被對待的現象。在這些對談中，「藏人」認同與其看似「原生」的難民及無國家身分 (born refugees, born stateless) 在受訪者的解釋中不斷被重述，除了作為我群與某種意義上相似他群 (同樣作為請求居留者或難民) 的區分，也似乎顯現了在國家或國籍這個宰制人群移動與身分安置的脈絡中，許多流亡藏人因為處在被排除或無法被安放的位置，² 在穿越或面對當代的國家體制時，反而試圖透過自己的「身分例外」，認知或解釋自我與他者有別、獨特的處境。正是從這些出生及成長於流亡情境中的新世代身上，筆者發現，關於流亡、移動與作為藏人難民 (Tibetan refugees) 的文化與政治身分認知，似乎正在以新的姿態、透過年輕一代不同的「移動」經驗與生存策略，以相似卻又透露著不同意義的語彙，被持續說著與實踐著。

這樣的觀察驅使筆者開始思考，當作為流亡藏人的陳述與概念，在新世代出現且自南亞向外遷移的過程中，仍不斷被提及與強調，作為在新社會立足、自我身分定義的重要依據，支援或提供其意義與內涵的情境脈絡與具體的經驗感知究竟是什麼？透過遷移

與再遷移過程中不同生命經驗的聚合與跨國社會網絡的實踐，流亡與作為藏人的概念是否會逐漸意義化成一種共同命運般的政治與文化身分標誌，從一種較為抽象的論述層次，連結起這些正在移動或散居在不同社會的人群？抑或，向外遷移所呈現的各種新的社群經驗，會透過全球化下各種網絡的運作（包括人群、知識、資源與資源等的流動），不斷重新集結，匯聚成銘刻於日常生活中相似、共同、卻又不斷衍生出新意義的經驗，持續為流亡與藏人的概念及社群想像提供實踐與論述的基礎？

本研究即是在上述的提問下逐漸成形，希望能理解藏人自南亞向外移居更加具體的移動過程、身分經歷與生活樣貌。筆者認為，這些持續跨國擴張且在各地不斷扎根深化的社群網絡與社會關係，應是理解當代流亡與離散藏人社會無法被忽略的視角。歐洲在近年逐漸成為南亞流亡藏人偏好的再遷移地區，³ 歐洲內部各國的差異以及歐盟政策所給予的高度流動性，使該地區成為理解藏人進行跨國移動時，如何因應各種界線的彈性與限制發展出多種策略的重要視野。在此脈絡中，法國作為許多藏人口耳相傳、歐洲國家中「較好」的移居社會，成為當代許多藏人遷移匯聚之所在。⁴ 也因此，本研究雖僅以移居至法國的藏人難民為對象，但期待由此開拓的視野與研究成果，能作為未來後續理解藏人離散社群發展及重省「離散藏人」（Tibetans in diaspora）在當代的意義（包括其是否為一個具討論意義的整體），議題深化及比較視野延伸的基礎。

本研究聚焦 90 年代中後期以來自南亞（印度、尼泊爾）直接或輾轉移居至法國的藏人難民，呈現其移動過程及在新社會的身分發展、生活樣貌與人際社會網絡。⁵ 透過不同個人的生命經歷與敘事，以及生活過程中各階段人群關係的建立與延伸，期待能對當代藏人的跨國移動現象有更深刻的理解，並從中觀察各種身分界線如何在遷移的不同階段與生活情境中被凸顯或隱藏，牽引不同資源與人群網絡的作用及意義。

本文主要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探討移動人群研究對當代人類學的意義及挑戰；第二部分梳理既有文獻對流亡或離散藏人的議題討論與研究發展，以及藏人跨國再遷徙的現象；第三部分呈現藏人難民從南亞到法國的移動、抵達法國後申請庇護居留的過程，以及在新社會逐步建立的生活樣貌與社群關係；第四部分聚焦「移動」對藏人遷移者的意義，以及「難民」身分講述與實踐的動態過程，並從中思考離而不散的關係連結與族群身分闡述如何在遷移與安身的過程中持續作用。最後，本文指出了藏人在陳述中所顯現的兩種國家身分型態，以及這樣的區分如何成為藏人遷移者意義化自我身分處境及生存策略的基礎，並為其當下與未來的生活提供目的與實踐的能動力。

二、人類學「移動」人群研究的當代意義

約從二十世紀中、末開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發展與全球化力量所帶來的地域、人群、制度與資本等之劃界與跨界，以及關於流動與固著現象的辯證與循環，讓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尤其向來以研究地方社群為核心的人類學家，意識到國家施為與全球跨國網絡之形成，不但是理解地方社群日常生活的重要面向，更成為形塑地方社會與人群樣貌的根本框架（Anderson 1991; Appadurai 1996; Clifford 1994; Geertz 1995）。許多學者開始注意外在環境對在地生活的影響、國家權力在日常細節的展現，以及人群與國家力量、在地與全球化作用間的對抗、衝突與協商，並提出人類學舊有研究方法與論述視野的侷限性。

在此脈絡中，看似身處「國家」體制外卻又與全球化「跨域」性質相呼應的「離散」（diaspora）現象與「離散人群」，逐漸成為人類學關注的議題，不少研究者開始思考，「離散」是否真的是在國家界線之外開創出一個平行、獨立的空間，抑或者，雖試圖超越「國家」體制與界限，離散論述與離散者仍不斷受其牽制、與之相應和，並由此獲得其存在意義（Clifford 1994: 306-308）。許多研究因此試圖透過「移動」人群（people “on the move”）（Diehl 2002: 7）所展現的動態人群界線以及「文化」的存續與再現，重新思考文化與社群界線的流動性、身分認同表述的彈性與可操作性，以及人與土地、文化與地域、族群與國家間不必然相連結的關係。這些方法與視野的重省與發現，促使少數／邊緣族群與族群邊界研究（如王明珂 1997、2003; Barth 2000; Gladney 1998; Rabinowitz 2001; Sa’ar 1998 等）、離散人群與難民研究（如 Clifford 1994; Cohen 1996; Fuglerud 1999; Harrell-Bond and Voutira 1992; Malkki 1992, 1995a, 1995b 等）、邊境／邊陲研究（如 Das and Poole 2004; Green 2005; Ishikawa 2010; Rosaldo 2003 等），成為人類學近二、三十年開拓發展的新領域。

在上述議題的發展中，不少學者針對「離散」所揭示的，既外於國家體制、又不斷與之進行協商的現象，或關於「難民」這個被國家創造出來的「非常態」（matter out of place）（Douglas 1966: 33）人群，提出各種發現與看法。許多研究者也注意到，跨國連結（transnational engagements）與「跨國性」，是流亡人群與離散論述不可或缺的重要特質（Clifford 1994）。如 Atsuko Matsuoka 與 John Sorenson（2001）針對自非洲 Horn 一地流亡至加拿大的人群之研究，即發現遙遠「家鄉」各種事件的發生，持續成為這些流亡者及其下一代意義化當下離散情境、強化身分區辨性的重要資源，且正是透過這些如鬼魂或影子般隨行的「過去」與「當下」，人們試圖反轉離散帶來的各種邊緣化處境，

為生活當下創造存在意義。而相較於探討流亡人群間如何形成內聚力的研究，Liisa H. Malkki 關於坦尚尼亞兩群 Hutu 難民的民族誌（1995a），則是呈現出「流亡」經驗的陳述與身分認同詮釋，會因行動者處於不同政治、社會情境與生活方式，發展出多樣的論述與實踐策略。

綜觀人類學既有研究中關於離散人群與難民議題的討論，我們可發現，在試圖納入新視野的同時一如強調政治、經濟與文化現象的全球化脈絡，或探討「國家」對人群分類與身分定義由上而下的制度化作為，大部分研究者關注的，仍是最細微、底層，那些關於生活日常的感知與經驗，以及關於選擇與行動的行為意義。傳統人類學強調的長期密集且小範圍的田野調查，以及從中積累的對人、社群與日常的近身觀察及微觀描述，讓多數人類學者在探討「移動」人群的議題時，意識到除了呈現作用於人群生活中各種大範圍的體制與力量，更不能忽略對行動者的關注（Tsing 2000），因為「人群」（people）與「過程」（process）是相互作用、互為脈絡的（Brettell 2003: 7）。正是這樣的視野，讓人類學的離散人群、難民與移民研究，相較於其他學科，更趨向從細微且深刻的層次展現生活經驗與生命敘事的力道，並由此理解國家、跨國與全球化過程，如何透過國族意識、流亡、離散等抽象、概念化的論述，具體化為行動者理解與實踐的日常。

然而，即使試圖兼具微觀與巨觀的視野，「移動」人群的研究本身就具有相當難度，這也是為何直到今日，許多關於流亡人群或難民的人類學討論，探討的仍多半是移動後聚居的人群（如難民營或難民集中居住之地）。在這些聚居難民的討論中，即使人們會進行日常移動，通常不包括長距離、甚至跨國的遷移。近身參與及長期、定點式的田野調查，是人類學民族誌最重要的特色，但如何在這個基礎上帶入「移動」過程（或不同「移動」階段）中，人與多點、多情境、多人群、甚至多種制度所建立起的往來關係，並呈現這些網絡作用於不同時間與空間的意義，似乎仍是當代人類學面臨的重要挑戰。張雯勤（Chang 2014）在其關於當代雲南離散人群的民族誌中，便嘗試透過較能深刻掌握的個人敘事與經歷，來克服研究對象散居、且不斷進行長程、跨國移動的狀況；該研究從敘事的角度，以大量口述資料，呈現當「移動」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跨國脈絡如何銘刻於日常、深入於移動記憶中；透過不同人物的故事，我們看到經由「移動」所串連起的、各種生命網絡的交會與離散，以及展現於其中的歷史、世代、性別、階級、國家與權力等議題，這也是筆者在本研究短期多次的田野中，試圖從對話者們的敘事中理解及呈現的部分。

本文關注的藏人流亡社群，其所展延的世代，自 1950 年代至今幾乎不超過三或四

代。這些在論述上仍自稱或被稱為「流亡藏人」／「藏人難民」者，其所連結、維繫於流亡與遷徙的生命經驗，鑲嵌於其中的世代差異與身分異質性，以及跨國／越界的網絡參與等面向，不但正是多數當代社會與人群所面臨的課題，更因其複雜且多樣的身分型態，提供了我們一個兼具各種可能性、卻又聚焦的視角，能廣泛且深入觀察身分政治在族群、國家與全球化等力量作用下的面貌。本研究希望藉此民族誌案例，展現對當代移動人群研究更多樣的視野與更具動態性的理解角度。在本文中「移動」至法國的藏人難民，呈現出處於「移動—一定住—（再）移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多樣性，筆者除透過近身參與的田野觀察，累積對各種「過程」與身分情境轉換的理解，亦試圖透過不同個人對「移動」的敘事，呈現既固著於生活日常、卻又嵌合於大環境的生命經驗與身分描述，期待從中深刻展現意義化個人生命的語彙與概念，以及各種陳述之間，人群關係與網絡動態、多元與豐厚的一面。

三、南亞流亡藏人的文化社會樣貌與跨國再遷徙

自 1950 至 60 年代大量藏人遷移進入尼泊爾、印度後，對流亡藏人的學術關注在 70 至 80 年代間逐漸出現，多數集中在探討流亡者抵達新社會後的適應與發展，如流亡政府的成立、屯墾區的建立、生計生活與宗教／文化的保存與延續（Cech 1987, 1993; Conway 1975; Michael 1985; Nowak 1984）。在 90 年代與 2000 年後，隨著「流亡」時日拉長，關於尼泊爾及印度藏人難民社會的研究討論，也進入了數量與議題皆快速成長的階段，許多研究者開始關注新世代在流亡與離散情境中的成長，如教育及身分認同之議題（Houston and Wright 2003; Mishra 2014; Liu 2015）；「家」（home）、「家鄉」（homeland）與「國族」（nation）等概念對不同世代的意義；文化與族群知識如何在客居的日常中被凸顯與實踐（Anand 2000; Dreyfus 2002; Falcone and Wangchuk 2008; Kolas 1996; Liu 2014; Venturino 1997; 劉培珊 2016a）；以及關於「傳統」與「現代」在文化價值、展演方式與認同延續中的衝突與論辯（Diehl 1997, 2002; Mills 2006; Harris 1997）。

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南亞藏人社群的人口不斷增加，讓原本已經具有多元樣貌的南亞流亡藏人社會，進一步展現出因世代差異及不同成長與客居環境而帶來的複雜、多樣的人群關係，也使部分研究者開始思考，逐漸轉為長期的「客居」生活，對新一代藏人具有怎樣的意義。Heidi Swank（2014）以居住在北印度 McLeod Ganj 的藏人年輕世代（包含了出生在印度者以及新近流亡者）為例，透過日常書寫，探討他們異質的生命經驗如何再意義化遷移在離散生活中的重要性。Swank 發現，對這些年輕世代而言，即使

許多人不曾經歷如上一代逃亡與集體長距離的移動，有人甚至從未離開過印度，但與「移動」相關的敘事與想望，卻深刻鑲嵌在他們日常生活的實踐中，透過人群交往（交友、尋找伴侶或與遠方／跨國的家人連繫）與日常書寫（如簡訊、Email、網路社群的文章書寫等），遷移的故事被這些年輕人持續說著，不論是成就了他們當下生活的重要性，或作為「未來」生活追尋的目標（*ibid.*: 171-173）。同樣的，Namgyal Choedup 在其博士論文（2015）的研究中，亦呈現了遷移或是作為一個跨境移動者，在當代藏人認同形塑中的重要性。Choedup 聚焦居住在南印度、跨越三個世代的流亡藏人，深刻描繪跨國的經濟機會與社群網絡，如何在他們生活中不斷碰撞著舊有「守在印度、等著返回西藏（Tibet）」的論述，餵養出當代關於「西藏」的兩種理解與詮釋：一個指向與土地連結的、已被包含進當代中國的「西藏」，另一個則逐漸脫離與土地直接連結的關係，指向透過跨國網絡的政治、文化與身分論述實踐，不斷具體化其社群意義的泛藏人認同。

上述研究呈現出流亡新世代的多樣面貌，以及他們不同面向（教育、政治、文化與經濟）的生活，也點出了緊密貫串在當代藏人—尤其年輕世代—生活中，關於遷移與再遷移的敘事，以及跨國網絡的連結與發展。筆者在田野中也發現，在印度，藏人客居身分帶來生活機會的限制與排除，讓年輕藏人無法將此地視為長居之地，因而會想辦法往印度之外（再）移動。首先，印度政府將流亡藏人放置於「外國人」類別中，⁶ 但由於藏人並不隸屬任何其他國家，這也使得印度政府成為照管這些藏人最主要的國家單位。⁷ 藏人生活中的各式文件幾乎皆是由印度政府提供，包括了居留證（resident certificate，常簡稱 RC）及可以在國際間移動的旅行證件（identity certificate，常簡稱 IC）；除此，藏人在印度境內與跨國的移動，也受到印度政府的管制，如，出、入境須分別申請出境與入境許可（exit & return permit）。另一方面，藏人與印度境內其他難民（如南部的坦米爾難民或德里的羅興亞難民）亦有所區別，即，雖然在國際組織論述中印度境內的藏人屬於難民，但他們不住在臨時難民營（refugee camps），⁸ 也不是由聯合國難民署負責，因而無法透過聯合國難民署申請前往第三國。由此可知，這個在印度治理下的例外身分，雖然給予藏人一個可以在印度生活的暫時空間，卻同時排除了他們進一步成為國家公民或由聯合國難民署安置到第三國家的可能性。

筆者好幾次詢問在印度或法國的藏人為何會想要遷移到「外面」，⁹ 多數人表示是為了「更好的生活」（“for a better life”）。至於何謂「更好的生活」，不少人會強調，藏人在印度被視為「外國人」，這個凍結般的客居身分，讓他們處在一個雖享有部分例外、卻也遭受各種排除，且無法改變的停滯狀態。他們除了在印度國家體制中不具參與

權利，生活許多面向也受到限制與排除（包括移動與工作機會的限制，以及無法持有／買賣土地與房屋等）。許多已經在法國的藏人或人在南亞但已將家中兄弟姊妹送往歐美者，則會進一步強調，「更好的生活」表示「有未來」（“have future”），歐美在物質及生活環境上是許多人想像中更富裕、充足的地方，而擁有這些國家的身分也代表著移居者及其下一代將有更多的生活資源、機會與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藏人新一代對「更好的生活」之追尋，並不是建立在沒有基礎的想像上，而是如同 Swank（2014）觀察到的，透過許多周邊朋友或家人的經驗述說，及日常生活中各種跨國、跨域關係的建立與實踐。這些資訊、故事與跨國的關係網絡，不斷充實、豐富關於「外面」世界以及「更好的生活」的具體面貌與細節。筆者在 2019 年初至印度進行田野時，拜訪了過去相當熟悉的一戶人家，這家人當時僅剩父母兩人及年約 30 的兒子札西長住在屯墾區，札西的姊姊與哥哥，已經遷移至北美各地。雖然跨居不同國家，但札西與兄姊們的互動仍相當頻繁密切，除了不定期的視訊通話，國外的家人也會輪流匯款作為札西與父母的生活費，或資助家中房屋的翻修，或寄送新款手機等電子用品。也因此，即使從沒離開過印度，但札西對其他國家的生活可說是相當熟悉，言談間充滿嚮往。¹⁰

綜觀至今累積的研究，針對向外進行遷移的藏人本身，或是關於南亞以外藏人社群的討論，仍非常有限，少數關注該面向的研究，多聚焦在透過專案計畫移居至國外者，而非由個人或家人協助進行的跨國再遷移。流亡至尼泊爾與印度的藏人，自 50 年代起便陸續有部分透過國際組織的再安置計畫移居南亞之外（Gyaltag 2003; Hess 2009; Tethong 2003），到了 80 年代，由於印度屯墾區中藏人數量不斷增長引發的居住空間與資源問題，使更多國家加入專案接濟的行列，讓遷移向外的人數顯著增加（Choedup 2015; Swank 2014: 134）。這些早期向外的遷移，多半是透過由瑞士、美國、加拿大等國家與藏人行政中央合作的專案計畫，是在人數、性別、特定屯墾區等有條件的限制下，選定合適者，再透過接收國家的專案協助（包括接收國的住處安排、生活與語言輔導、工作媒合等），有系統、集體地向外遷移。近年來，因各國都面臨移民人數與生活空間的限制，針對印度藏人的專案再安置計畫幾乎已不再見。¹¹

Gyaltzen Gyaltag（2003）與 Wangpo Tethong（2003）關於歐洲藏人的概況呈現，主要就是針對早期（1960 至 1980 年代）分批、集體移居至瑞士者，Gyaltag 描述瑞士藏人社群在移居後的發展及面臨的世代交替，Tethong 則針對 1970 至 80 年代間出生於歐洲者，發現這些逐漸邁向中年的第二代，雖然透過父母的敘事、文化慣習傳承及參與跨國

政治組織與活動等，仍維繫作為藏人的身分認同，但在他們之後的下一代，則正面臨語言流失與身分認同更加模糊的問題，Tethong 更指出，新近自印度與中國藏區移居歐洲者，正使當代歐洲的藏人社群呈現愈趨複雜的樣貌。同樣是針對較早期的移居者，Julia Meredith Hess (2009) 的民族誌，探討 1990 年透過再安置專案至美國的藏人，在新社會的生存策略與身分協商。Hess 深刻呈現出這些流亡、無國籍人群在進入「國家」體制時所面臨的困境：如填寫移民與入籍等相關表格時，必須填寫「原生」的公民身分 (citizenship)，然而表格分類並沒有「其他」或「無」的選項，承辦人員便依現有國家之公民（如出生於藏區者即為中國公民）建議申請者以此填寫。¹²Hess 藉此呈現無國籍流亡者在當代社會面臨的身分例外，並進一步指出，在與各種國家及人群分類的協商過程中，這些流亡者亦逐漸發展出妥協之外的抵抗策略：包括透過各種人群組織的協助改變既有的分類方式，以及將公民身分與國族／國家認同分離的身分論述。

相較於 Hess 研究中的藏人多為較「同質」者，Emily T. Yeh (2007) 探討的則是不同時期、經由不同路徑進入美國的藏人。Yeh 從這些藏人日常生活中呈現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經歷差異，提醒我們關於 Tibet (西藏) 以及 Tibetan-ness (藏人性) 的認知、詮釋與實踐，是多義、流動且不斷「再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具有不同生命與移動經驗的人群，透過相遇、互動所構築出的認知與網絡，不斷為「離散」、「流亡」、「家鄉」與自我身分的述說，帶入新的元素與脈絡。

綜觀上述研究，我們不難發現，近年來對流亡藏人的探討雖已逐漸增加，但多數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仍限於以流亡或無國籍身分居住在印度或尼泊爾的藏人社群，較少學者延伸探討這些藏人自南亞往其他國家移動的現象，及移動之後的生活樣貌。¹³ 我們似乎也較少看到有文獻進一步探討在流亡情境中持續產生的、關於「(再)移動」的敘事與行動，以及它們如何為這些移動者的選擇身分論述與生存境遇提供意義與能動性。對此，本文針對近期透過個人或親友網絡遷移至法國之藏人難民的探討，期待能作為理解當代離散藏人跨域比較的新視野，為文獻討論中近乎空白（或呈現斷層）的歐洲藏人社群，提供較新的人群樣貌與生活境遇。

四、從南亞到法國、從流亡難民到底護居留

本研究的田野場域是在法國的大巴黎地區 (Île-de-France)。巴黎作為法國首都，是各種身分認定的公部門最集中分布之處，許多申請庇護的難民都會停留於此，包括剛抵

達法國、正要準備申請難民庇護以及正處於身分認定過程中者；許多已通過面談、取得居留身分的藏人，也因為此地有較多工作機會而持續居住於此。筆者在田野過程中拜訪的多數藏人，幾乎都居住在大巴黎地區的西北部，其中又以在 Hauts-de-Seine 與 Yvelines 兩區者為多。Val-d'Oise 區中的 Conflans 一帶，則是自 2015 年開始，即有許多藏人在河畔扎營暫居，等待身分認定與處所安置，本節下文會提及的丘頓與諾拉，剛到法國時都曾於此生活過一段時間。

本研究時程雖達兩年多，然筆者因無法長期居住，資料蒐集與田野人際關係在初始常流於片段及瑣碎。所幸，這幾年持續不間斷地拜訪，一方面彌補了每次田野中斷後，被打亂、需要反覆重新釐清與熟悉脈絡的「進入」過程，另一方面，筆者也逐漸感受到對於身處法國的許多藏人而言，趨近於固定、短期的拜訪，反而更能切合且融入他們身處歐洲城市的生活狀態，不同於藏人們在印度多以聚落（屯墾區）為核心的日常步調，歐洲城市的生活讓他們在人際關係的維持與社群連結上，似乎更依賴網路社群，以及固定於假期間（如冬季與夏季假期）出遊拜訪的互動型態。

筆者在巴黎所接觸到的多數藏人難民，除了部分是在印度或尼泊爾出生（父母多為第一代的流亡者，在 1950 至 60 年代離開西藏），有不少是出生於西藏各區，年紀較小時（多數在 15 歲以下）即離開，在尼泊爾或印度生活多年並接受教育。也因為這樣的多樣背景，這些在法國脈絡中具有同質身分—「藏人難民」的人群，彼此間仍存在著不少差異性，展現在語言語調、飲食與生活習慣中。如，在中國藏區生活較久者，藏語多帶有濃厚地方語調、參雜許多中文詞彙，他們也多會簡單的中文。而在印度出生或居住長時間者，日常藏語中除了參雜不少北印度語彙或英文，其聲調與用法也與來自中國藏區者有所區別，除此，他們多半不諳中文，但具有基本程度以上的英文能力，使他們在文件填寫或日常應對，比起不會英文者較少遇到阻礙，與非藏人的往來互動也較為容易（以英文為媒介）。¹⁴

（一）前往法國

從土耳其到希臘邊境，我們必須在晚上奔跑。...其中有一個小湖，我們搭船跨越，是那種需要用身體平衡的小船，不是大船。...在那之後，我們繼續跑，地上都是泥濘...我是最小的，所以負責人抓著我的手跑。到了早上，我們到達邊境，就在那邊休息。我們睡了幾乎整個下午，然後來了兩臺 BMW 的車子。...從希臘邊境到境內花了將近 8 小時，但我們還未到達城市。在那之後，

我們改搭公車，才終於抵達城市。如果我們在希臘沒有付給他們剩下的錢，他們不會把我們送到目的地。（丘頓，巴黎，2018 年 7 月 31 日）

20 多歲的丘頓，¹⁵ 出生於中國藏區的一個大家庭，家中有近十個兄弟姐妹，她不到 10 歲時就隨著親友前往印度。當她在印度完成了接近高中階段的課程後，在親戚協助下，透過仲介安排前往法國。上面這段話即是她從印度前往法國的部分過程。

我與丘頓第一次見面是在 2018 年夏天，透過友人拉莫的介紹，我們一起在拉莫家聽丘頓述說這個漫長的旅程。一同從印度離開的，還包括其他幾個藏人。這段從印度前往法國的旅程，歷時約兩個月，跨越了泰國、土耳其、希臘等地，最後才抵達巴黎，轉換的交通工具包含了飛機、小船、汽車與雙腳步行等。丘頓在敘述中提到了與其他友人們待在泰國，吃到好吃食物時「愉快」（happy）的回憶，以及在半夜從土耳其跨越邊境至希臘的場景。丘頓因年紀最小，總是落後，最後是靠著領隊拉著她一起跑才不至於脫隊，「那個領隊是一個好人」，丘頓這樣說。抵達希臘後，丘頓特別強調來接他們的車子是 BMW，但超過乘載人數的大家卻必須盡可能塞擠進車內，豪華的車型外觀與沙丁魚般擠滿車內各處的團員們，以及逃難式地奔跑跨越邊境的經歷，在丘頓的敘述中呈現出巨大的差異對比。這一段漫長且移動距離跨越好幾洲的旅程，透過仲介組織綿密的網絡串連起來。¹⁶

同樣出生在中國藏區，年紀稍長（近 30 歲）的諾拉，到法國前已在印度完成了碩士學位。我與諾拉是透過臉書的共同朋友而認識，2018 年的藏曆年間曾在巴黎見過面，但直到同年夏天再見面，我們才逐漸變得熟稔。在一次談話中，我隨口問起諾拉是否去過歐洲其他國家，¹⁷ 她說出了一個地名，但無法清楚指出所在國家。我們在 Google Map 上查詢了一陣子，才終於確定這個地方位於阿爾巴尼亞，她來法國前曾經在那裡停留了約一個月，也因為這樣，諾拉才說起她到法國的經過。

諾拉也是透過仲介組織安排行程，她的旅程歷時約三個月。與丘頓不同的是，諾拉的移動幾乎都是透過航空飛行，跨越了斯里蘭卡、馬爾地夫、摩洛哥、阿爾巴尼亞以及匈牙利，最後抵達法國巴黎。「所以我去過很多國家了」，諾拉笑著對我說。對於旅程的細節諾拉並沒有多談，只知他們不斷更換護照，不會中文的人則必須學會清楚唸出自己的名字及簡單問候語，以應對海關可能的詢問，而其所提到的仲介網絡，也是類似丘頓的狀況，綿密分布在各國。

在法國，許多藏人難民都有與丘頓及諾拉相似的移動經驗，¹⁸ 在他們的故事中，不同的只是移動路徑與花費的時間。除了透過仲介，也有不少藏人是經由其他方式到法國，

如，隨著已有居留或公民身分的配偶而來，或是在拜訪親友後留下來。¹⁹ 這些藏人難民不同的移動方式，呈現出每個移動者（或其家庭）擁有的資源、資金與人群網絡之差異，如拉莫與達娃都曾表示，家裡的經濟能力無法負擔透過仲介移動所需的大筆費用，然而，她們卻擁有丘頓與諾拉較缺乏的跨國人脈資源。

當筆者更進一步詢問如何決定及準備到法國時，除了幾位僧侶說明是自己的選擇外（理由多半與此地已有教派的宗教中心，並有許多僧侶朋友在此有關），許多人都提到一開始是家中較年長的兄姊決定，如頓珠與拉莫的移動，主要是由兩人的僧侶兄長討論決定，當年他們的機票與部分旅行費是由頓珠在北美的哥哥提供，移動所需的人脈網絡則是由拉莫的哥哥提供。丘頓小時候從中國藏區到印度，以及再從印度到法國的移動，則是由家中長輩、姊姊及在印度寺廟的表哥籌劃進行。這個過程呈現出幾個有趣的現象：第一，親戚或家戶中較年長的兄姊，尤其是出家在寺院或比丘尼庵者，常是家戶中較權威、做主要決定者，他們因擁有較多資源，除了會幫家中年幼的弟妹安排國外的認養者，也常提供家人跨國移動所需的資金與人脈。許多移動到歐美者，在生活安定後，也會成為在中國或南亞之家人生活及向外移動的主要資助者。至於移動國家的選擇，除了親友間的消息資訊，多半是根據移動的難易程度、人脈網絡及資金多寡等而定。第二，在某些家戶中，筆者也觀察到親友間及家戶裡有計畫、具有先後次序的移動策略，透過人脈與資金的連結，讓家中的兄弟姊妹陸續前往其他國家。²⁰

筆者也發現，移動經驗的差異除了與移動方式有關，是否有熟識的同行友伴，或在地親友的有無，也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深刻影響著移動者到法國後的生活過程與感受。如，當拉莫與頓珠來到巴黎時，舉目無親、沒有任何朋友，也不知如何申請難民庇護以及去哪索取生活物資，他們是在經歷許多碰撞與摸索後，才逐漸從其他難民及新的藏人朋友中瞭解流程。相對地，丘頓雖然年紀較小，但因有好幾位藏人一同從印度出發，大家在漫長的旅程中，一起生活、聊天、體驗不同國家的氣候環境與食物，成為好朋友，這讓她在講述移動的經歷時，好幾次提到旅程雖然驚心動魄，但也充滿許多快樂回憶，這些朋友即使後來各分東西，去了不同的國家，但還是保持聯繫，互相更新近況與發展。抵達巴黎後，丘頓也因有親戚姊妹在此，兩人買了帳篷，與其他藏人暫居在巴黎河畔，這讓丘頓在法國的生活自一開始就有親屬陪伴。相較於有家人在法國的丘頓，以及相伴同行的拉莫與頓珠，諾拉的旅程以及初到法國的生活似乎較為孤單，長達三個月跨洲、跨國的旅程，加上抵達巴黎後語言不通及長時間隻身居住在帳篷中的經歷，讓諾拉在談話中，常提到在此的生活「很無聊」，她除了開始思考如何能夠到其他英語系國家繼續

念書，也好幾次說著想念姊姊（堂／表姊）與在印度的朋友，甚至興起了是否乾脆回印度的念頭。

這些在近幾年陸續移動到法國的藏人難民，他們跨越邊境的旅程與經驗，與 1950 至 60 年代從中國到尼泊爾及印度的藏人們非常不同，展現出與過去不同的移動經驗與社會網絡。這個新的跨國移動與定居（re-settling）過程，形塑著許多新一代年輕藏人的人群經驗，以及對自我身分的定義、解釋與實踐，這在抵達法國、開始進行難民庇護申請的過程中，不斷被表述、再現與確認，成為構築這些藏人難民在新社會生活的重要基礎。

（二）「難民」身分認定、居留許可、成為「公民」

筆者在田野過程中，觀察到藏人在難民庇護申請過程中必須經歷幾個階段：包括註冊、面談、獲得正式居留身分等。這些階段劃分的用語，常出現在藏人與朋友及遠方家人的日常對話裡，成為解釋身分與生活在新社會如何「進展」非常重要的參照。也因此，以下依據藏人口語中的階段劃分，呈現法國難民庇護申請的流程、藏人在不同階段的經歷與敘事，以及這個或長或短的「等待」過程對申請者的意義。

1. 註冊（registration）

我們在白天是觀光客，晚上是難民（笑）。在獲得（分配的）房間之前，我們只能待在外面。（達娃，巴黎，2016 年 7 月 2 日）

要在區公所註冊，必須先在外面排隊。他們一天只接受四個人，所有難民都在爭奪最前面的四個位子。我們從半夜開始等待，沒人知道要等多久...在那邊等待的難民非常多...（每天）進入半夜時，頓珠與其他人會從不同方向跑向（區公所）門口並自動排成一直線，那個畫面真的很好笑。我通常待在公車站的長椅上看著，每次只要有警察接近，隊伍就會散開，等到警察離開，所有人又會從四面八方快速集結成一直線。所以整個晚上，排隊的那條線就不斷的出現與消失，我每次都在裡面找頓珠，他有時候在第一個，有時候在第二或第三個，有時在很後面...幸運的是，在第三天，當區公所的門一打開、大家湧向門口時，有一個保全人員抓住了我的手，把我拉到第一個，當他抓住我的時候，我也快速抓住頓珠的手，因此他成為第二個人...那天，我從區公所獲得了一個房間。（拉莫，巴黎，2016 年 7 月 19 日）

達娃與拉莫的描述生動呈現出許多難民抵達法國後的狀況，如在區公所外徹夜排隊、競爭隊伍先後次序的情景，也點出了他們在法國生活的第一個階段：露宿街頭，以

及日復一日、無止盡的「等待」。

在法國，欲申請難民庇護者，須先向所在分區（arrondissement）的受理行政機關「區公所」（préfecture，為各區行政中心）登記身分，審核通過後，會獲得一個月效期的「暫時停留許可」（autorisation provisoire de séjour, APS），該難民才能開始正式的庇護申請。以大巴黎地區為例，各區公所每日受理的人數有限額，因此，當申請者眾多，要等候到進入區公所填寫登記表格，往往就會花上幾個星期甚至超過一個月的時間。²¹ 在這個過程中，申請者可說是完全「沒有身分」的人，許多人就像達娃說的，白天只能遊走於巴黎各處，直到晚上才回到區公所前準備徹夜排隊。

當申請人終於進入區公所，身分登記的第一步是必須填寫簡單的基本資料表格（姓名、國籍、生日、父母姓名等），作為核發停留許可的依據。這些資料在承辦人員初步評估後若沒問題，申請者即會在 15 天內收到「暫時停留許可」，並可開始填寫難民庇護的正式申請表，填寫資料包括姓名、生日、出生地、家庭成員等，並須說明為何到法國進行難民庇護。作為藏人，申請者還必須向藏人行政中央駐巴黎的辦事處（Bureau du Tibet Paris）申請藏人身分證明，這張證明應連同註冊表格一同提交給 OFPRA（Office Français de Protection des Réfugiés et Apatrides）。

在法國，申請人在進入難民庇護的申請流程時，其身分會被連結到兩個系統，一個是針對其難民身分進行核查、決定是否給予庇護的單位，主管機關為 OFPRA，身分考核的面談即是由該機關進行。另一個是針對申請者在法國停留期間的生活提供社會支持的體系，主管機關為 OFII（Office Français de l'Immigration et de l'Intégration），負責審核並提供申請者居所與其他社會資源（包含健康保險、語言課程、學校就讀或職業技能的訓練），²² 通常會分配申請者可接洽的社工，由其提供第一線的資訊諮詢與申請項目的文書協助。這些由社會支持體系所提供的社福資源，讓申請者在身分等待的過程中，即可逐步建立自己在新環境的連結關係，也成為他們在通過 OFPRA 的面談後，進行長期居住規劃的重要基礎。²³

OFPRA 在收到請求庇護的文件後，即會對申請人的身分進行更仔細的查驗，若通過初步審核，申請人會收到 OFPRA 核發的三個月效期居留證（récépissé，可展延，每次為三個月），表示申請資料已被註冊，進入「等待面談」的階段。

自 2015 年開始，法國政府針對難民進入法國後身分登記以及提出庇護申請的階段，引入了單一平臺（single desk）整合作業模式—GUDA，²⁴ 希望能縮短身分註冊與庇護審核的時間。在這個新規定下，難民必須先向 PADA（Plateformes d'Accueil pour les

Demandeurs d'Asile)²⁵ 報到，該平臺會協助申請者向區公所或 GUDA 預約面談及申請資料遞件的時間，申請者就不用到區公所外排隊等待。然而，這個希望簡化並縮短申請時間的目的似乎沒有達到，不僅申請流程更複雜，申請文件延遲時間也更久，²⁶ 尤其在難民人數眾多的大巴黎地區。對此，法國政府自 2018 年 5 月起，針對大巴黎地區的難民庇護申請，進一步引入「電話註冊預約」機制：欲申請庇護者，須先透過 OFII 設立的電話專線（提供法語、英語及阿拉伯語三種語言）進行預約，再依預約時間至 PADA 報到。²⁷ 雖然看似出現了許多新規定，但筆者在 2018 至 2019 年間詢問的受訪者（其中不乏在 2015 年或 2018 年之後申請難民庇護者，如丘頓、諾拉等），其所陳述的登記過程都與 2015 年前申請庇護者（如拉莫、頓珠與達娃）相似，即他們皆是直接到區公所外排隊等待，這個規定與實際過程的落差，仍然值得進一步關注。²⁸

2. 面談 (interview)

當 OFPRA 完成申請人的背景調查，正式將其資料建檔後，即會開始安排面試日期。根據筆者訪談所得，2015 年以前抵達法國的藏人，等待面談時間約為半年到一年（從收到三個月效期的居留證算起），近幾年（2016 至 2018 年）抵達法國者，等待時間則大為縮短，有些人甚至只等了一至兩個月。²⁹

在面談過程中，申請人填寫的資料及申請動機多半都會再被詢問與確認。由於藏人幾乎都不會說法語，OFPRA 會安排一位翻譯人員，透過藏、法語的交叉翻譯協助面談進行。面談結束後，申請人就進入「等待結果」的階段。³⁰

3. 獲得正式居留身分 (getting papers)

在面談通過後，申請人會陸續收到獲得長期居留資格的通知函，以及註冊正式居留身分的申請表格，接著，就會收到正式的長期居留證。獲得長期居留後，多數藏人的身分申請即進入尾聲。近年來，由於成為法國公民並不容易（須通過對許多藏人而言相當困難的語言考試），僅有少數人會在短期內再進一步成為公民。³¹

在法國，難民庇護許可者獲得的居留效期皆為十年，可不斷延期。在筆者的訪談中，許多人都曾提及，他們認識的其他非藏人朋友（包括中國籍、越南籍及部分非洲裔申請者），幾乎沒有人一次就獲得十年居留許可，他們認為，藏人因是「政治難民」，所以能獲得最長期的居留資格。然而，根據筆者所蒐集的資料，法國政府針對核定為「難民」身分者，皆是給予十年可延期的長期居留證，³² 受訪者所提其他非藏人申請者，很可能是僅獲得「次要保護」（Subsidiary Protection）³³ 的資格，而非以難民身分獲得認定者。

上述的「比較」說法，雖然難以從政策內容獲得實質的支持證據，³⁴ 卻常在藏人們的日常閒聊間，以及他們與親友的網路談話中聽到，顯現出難民身分的申請，往往也是這些藏人重新理解、界定自我身分處境的過程。

4. 成為公民 (becoming citizens)

拉莫在幾年前通過公民申請的語言門檻後，即開始準備進行公民申請。在經歷了面談與一年多的等待後，拉莫才終於收到申請通過的信函。筆者某次結束田野回到臺灣後，收到拉莫傳來她與小孩穿著藏服，被授與公民證書的照片，一家人正式成為法國公民。除了拉莫，原先因幾次語言測驗都沒通過，幾乎已放棄申請公民的達娃，則因為身體受傷，無法繼續原本的工作，考量公民身分會增加就業機會，於是在朋友的鼓勵下，再次參加語言考試，並順利通過。通過語言測驗後，達娃也開始準備相關文件，進入了公民申請的階段。

筆者在訪談中發現，公民身分雖然是多數在法藏人渴求的目標，但因法國政府自2012年起規定，六十歲以下欲申請入籍者必須擁有中級法語 B1 的聽、說能力，³⁵ 讓許多忙於家庭或工作，沒有時間精進語言，在日常生活中也少有機會練習法語會話的藏人，無法取得公民申請的基本資格。筆者的受訪者中，許多人都曾參加語言考試，但多數人在一、兩次的失敗後即會放棄，少數年紀較輕者（25 歲以下者，如丘頓），則因法國政府會協助安排學校就讀，未來可以透過學歷證明而申請公民。也因為這樣，部分藏人表示，能夠擁有法國長期居留的身分，可以工作、生活，必要時也可進行跨國移動，已經足夠。雖如此，亦有少數人受困於語言及無法成為公民的身分限制，而尋求再一次移動的機會。³⁶

5. 身分「等待」過程中各個階段的意義

如前所述，在法國等待「身分」或長、或短的過程，被藏人們區分為不同階段：等待註冊、等待面談、完成面談，以及獲得身分證件等，這些區分用語常出現藏人彼此的談話中，成為意義化法國生活過程非常重要的身分參照指標。隨著跨越每一個階段、更換新的身分文件，以及逐步增多的居住權利與社會資源，藏人難民在新社會的身分輪廓逐漸具體、清楚，生活未來的想像也變得可期待與可規劃。而除了身分在各個階段「前進」的過程，住所從無到有、從多人共住到獲得獨自居住的空間，或從單人房到公寓居所（通常是有小孩的家庭才能申請）等生活狀態的改變，也是藏人們用來標示生活階段進程的指標。

這些日常生活中的談話用語，對話的彼此往往一聽就可以理解各自或所談論對象正處於的身分階段，有時也會相互比較經歷過程的長短，或分享（提醒）還需等待的時間及接下來的程序細節。筆者也發現，許多人只要完成或進入下個階段，如收到面談的日期、面談通過，或是獲配住所、申請到多房間公寓等，就會與遠方家人以訊息、電話或視訊的方式分享，或是請家人去寺院祈求過程順利。也因此，身處在印度或其他國家者，即使沒有親身經歷這些過程，往往也可以在日常談話中，向親友說明歐洲家人或友人所處的身分階段及經歷過程。

整體而言，對來到法國的藏人難民來說，努力讓自己在這個新社會「安身」的過程主要有三個面向：獲得「居留身分」（“got the papers”）、擁有「居住空間」（“got the room / house”），以及「找到工作」（“got the job”）。這三個過程有時是同時、重疊進行的，也是親友們日常對話中最常提起、討論的話題。如前所述，在法國，難民進行身分註冊時，即可同時申請住所（通常為單房間），然而何時獲配房間，往往視當時等候的人數及空房比例而定。由於近年進入法國的難民人數急劇增加，多數申請者必須等待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獲配一間單人房。對還在等待身分認定的人來說，獲得一個可以居住的處所，即使只是一間房間，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值得與在地或遠方的親友分享慶賀，這是因為它標示了自己在法地的「安身」過程進入了另一個階段，不用再流落街頭，也不須再與其他人擠在小小的空間中。擁有這個單獨的空間，也表示自己在法國的生活朝向一個更具有「未來」可能性的方向前進。也因此，筆者多數的友人，幾乎都是在獲得獨立的居住空間後，開始尋找工作，³⁷也大概是在這個階段後，多數人在心態上，開始步入「生活」在法國的階段。³⁸

隨著身分申請跨越了一個又一個階段，許多人在自我生活的安置或發展上，也逐漸擴展，如，找到了伴侶，開始一起生活，或是有了下一代，開始規劃申請更大的居住空間，有些人則是計劃著如何把遠方的小孩或父母接過來。除此，大部分的人會更積極尋找工作，甚至在工作的選擇與規劃上，展開更「長遠」的考量。

（三）生活在法國：日常樣貌、社群關係與跨族群經驗

1. 「獨立」、「長大」與擁有更多「選擇」的新生活

在這裡（法國）的生活是真實的。之前在印度時，我從未擔心過每天的早餐、午餐與晚餐...我從來不知道生活會有什麼問題。在這裡，我必須為食物、花費與文件問題擔心，要小心計算每一筆花費以及想辦法省錢，也必須學會要

去哪裡申請所有的文件。我感覺現在的自己長大了，像個大女孩，像個女人。之前在印度，我根本不知道生活是什麼。（拉莫，巴黎，2018年2月18日）

當我回頭看（在印度的生活），我覺得學校老師對待我們就像是用湯匙在餵養嬰兒一樣，他們照顧我們所有的事情，讓我們不必為生活擔心，這並不是一件好事。在這裡（法國），我必須學會自己做每一件事，我覺得我現在比以前更獨立了。（丘頓，巴黎，2018年7月31日）

這兩段話是筆者詢問來到法國後的感受時，拉莫與丘頓的回覆，兩人都點出了在這裡體會到成長、變得獨立，學會自己做很多事，開始知道「生活」是怎麼回事。不只女性，男性也是如此，如頓珠，身為家中六個孩子中的老么，他在印度時幾乎沒吃過苦或做過什麼家事，到法國後，不諳英、法文，加上靦腆的個性，讓頓珠在一開始非常受挫，幾度嚷嚷想要回印度。然而，經歷了各種過程後（包括多種工作轉換、孩子陸續出生、法語也漸漸上手），今日的頓珠不但在家時幾乎包辦所有家事，也可單獨去各機關辦理許多文件，或以法語跟孩子學校的老師與家長們進行簡單對談。除此，由於每日工作往返的交通轉乘，也讓頓珠對巴黎市區到郊外複雜的交通系統瞭若指掌。在拉莫眼中，頓珠與當年來到法國時那個懼怕與陌生人說話、哭著打電話回印度的模樣已大不相同。

許多到法國的藏人難民，都是已在印度（僅少數是在尼泊爾）成長或生活了一段時間者，他們在印度時，多數都居住在藏人屯墾區，或是住宿在以藏籍學生為主的學校中。³⁹ 群居形成的環境與互助機制，讓大部分藏人在生活中不需面對語言溝通與求助無門的困境，即使因為非公民的身分，讓他們在出了屯墾區，到外面念書或尋找工作時，遭受許多挑戰與困難，也總是能夠在回到藏人聚居的區域時，因語言及生活文化的相近而感受到暫時的放鬆或尋求協助，這也是為什麼拉莫與丘頓會提到，他們在印度時比較不需要「自己」獨立面對許多生活中的事物。

在法國，身為尋求庇護的「難民」，雖然讓藏人們感受到身分被逐步安置、被國家與社會制度「納入」的過程，生活充滿新的選擇與機會。然而，要在一個新社會開展生活並不容易，尤其是語言，這也是多數藏人來到法國後最深刻感受的生活挑戰，部分藏人因對英文也相當陌生，無法在生活的許多部分進行基本溝通或文件填寫，導致在一開始的生活相當艱辛。除此，有些人即使已有親友在法國，但多數時候生活裡的挑戰還是必須自己面對，如日復一日排隊等待進入區公所、填寫資料並回答基本問題，與社工人員討論生活安排、領取食物、準備面試等。然而在另一方面，忙碌的生活安排、身分申請與持續「進展」的生活階段，也讓許多來到法國的藏人，第一次意識到生活充滿變動

的可能性，感受到自我對生活進行選擇與改變的意義，這個過程透過幾個清楚的指標（住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改變，生活從一人到兩人、或從兩人到有小孩，以及身分經歷不同關卡、證件的轉換等）被劃分為不同階段，也讓生活與身分的「前進」變得更加「真實」有感，這大概也是為什麼拉莫用「真實的生活」／「生活變得真實」（“real life”）來形容在法國的感受。

雖如此，在法國充滿挑戰、陌生、甚至孤單與挫折的生活經驗，對照在印度屯墾區或學校的生活，是否真是「更好」的生活？拉莫曾經表示，在印度的生活雖然看似沒有煩惱，但也「不會有進展」（“no progress”），像人生已經到達終點一樣。拉莫認為，她與頓珠如果繼續留在印度，下一代仍然會跟他們一樣，過著沒有目的與未來的生活，因為藏人在印度並沒有太多生活選擇，連流亡政府都無法依賴。拉莫也進一步提到，雖然初到法國時經歷了不少挫折，但她在這裡可以嘗試很多新選擇，例如她已透過餐廳實習獲得廚師執照，也正在面試幾個幼兒學校的保母實習，這都使她將來有更多樣的工作選擇。達娃則是對筆者詢問為何不想待在印度時，直接說出「待在印度有什麼用」（“what’s the use of staying in India”），她提到自己到法國後，可以寄錢給父母，改善家裡的居住環境，孩子也可以學習不同事物、發展各種興趣，較有「未來」。⁴⁰

筆者認為，所謂更好的生活，事實上是建立在非常多面向的比較、取捨以及協商的過程中，這些面向包括了新社會或國家身分可提供的生活機會與資源、物質生活的比較（工作機會、經濟環境等）、自我對生活可掌控與規劃的空間，也包括了族群文化延續的可能性，⁴¹ 以及是否能提供自己的下一代及家人更多生活資源及生活方式的選擇。對本研究中許多來到法國的藏人而言，在此地的生活雖然有許多挑戰，但物質與經濟生活的進展，以及在生活中開拓出的許多機會（如學習新的技能、建立家庭等），已經讓他們可以安於在這裡建立自己與下一代的新生活。當然也有少數人，在法國感受到無法跨越的困境與挫折，或持續比較此地生活與其他地方的差異，思考進行再一次的移動。⁴²

2. 社群網絡與「跨國」的關係實踐

部分到法國的藏人，之所以選擇該國，是因為在此地已有親友，這些直接或間接連結起來的人際網絡，成為許多人在法國生活適應、資訊取得及日常往來的重要支持系統。除了直接的親屬關係，間接串起的親友網絡，也常見於藏人的日常互動中。如，拉莫在 2018 年初接近藏曆年時，得知兄長好友的弟弟巴登也在巴黎，還處在身分等待的階段，由於巴登年紀較小（二十歲左右），遠在南亞的哥哥擔心其狀況，託友人聯繫拉莫，拉莫在當天便邀請巴登到家裡。當時除了筆者正在拉莫家，頓珠的親戚也剛好來訪，拉莫

與頓珠準備了藏式饅頭作為晚餐，也讓巴登在家中住了一晚。晚餐時，巴登提到他是近期才進入法國，⁴³ 由於巴黎各區提供給難民的居住空間都滿了，他原先住在一所教會提供的「船屋」，直到天氣轉趨寒冷，區公所考量船上與帳篷區禦寒設備不足，於是將許多藏人暫時移動到其他區域的收容所，⁴⁴ 多數人被轉移安置在離巴黎相當遙遠的地區，如法國南部與西班牙接壤的邊境，巴登則較為幸運，獲配的暫時居所仍在巴黎外圍。

隔天巴登離開前，拉莫等幾個大人湊出了一筆錢給他作為生活零用金，並不斷提醒巴登有任何事需要幫忙都可以聯繫他們，或直接到家裡來住幾天。筆者在過程中深刻感受到這種互助網絡與人情連結在「異地」提供給新進移居者的支持，這也呈現出除了依靠在法的遠親或姻親，部分藏人是透過間接的人情網絡獲得照應與協助。

除了這些直接、間接的親友關係，因同為「藏人」身分而產生的連結與網絡，也在許多人的新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如不少人對於難民庇護申請的細節知識、該去何處領取食物與生活物資、如何申請住處及尋找工作等，常是得自於到法國後認識的其他藏人。⁴⁵ 這些可能是在閒晃、排隊或領取食物時辨識出的同為藏人者，或是一起居住在「船屋」或帳篷區者，形成了一個以語言及族群認同（Tibetan）為連結基礎的資訊網絡與社群邊界，不論是親身的經驗與經歷，或是從親友處「聽說」得來的訊息，透過分享與閒聊，讓許多新到者得以想像「等待」的過程與階段，且在身分申請與生活過程中提供他們尋找協助或進行評估與選擇的資訊。

這個因為「藏人」身分而形成的連結關係，讓許多隻身到法國的藏人有了可以聊天、聚會、甚至一起逛街的友伴，逐漸形成新的人際網絡與社會關係。在達娃居住的社區中，有另外兩、三戶藏人家庭，他們有些是單親狀態（如達娃），有些則是因為男性配偶在巴黎之外工作，家中長期僅有媽媽與孩子（如下文會提及的貝瑪）。這些藏人媽媽們除了常互相串門子、約出去逛街、舉辦小孩的慶生會、野餐聚會等，彼此的小孩也是生活裡互動頻繁的玩伴。

筆者在 2018 年初拜訪達娃時，她在一間連鎖飯店的工廠工作，每日負責將運送到工廠的大件床被單與窗簾等送進機器清洗。該工廠的工作時間分為日班與夜班兩種，日班是自下午一點至晚上八點，夜班則是從凌晨約四點開始，將近中午結束。達娃因家中還有一個處於國中階段的孩子，沒有輪值晚班。⁴⁶ 然而，也因為日班的時間佔據了幾乎整個晚上（她每天回到家都已是晚上九點之後），使她無法接孩子放學，也很煩惱小孩的晚餐問題以及是否亂跑。達娃通常是拜託同為藏人的鄰居幫忙照管小孩，孩子往往會在鄰居家吃飽後才回家。除此，達娃住在較遠地區的姊姊也常會透過社群網絡告誡放學

後的姪子不要亂跑，或以電話「確認」其即時狀況。這樣的情境顯現出同為藏人鄰居間的相互幫忙，以及緊密的親屬網絡在藏人日常生活中提供的支持。

除此，筆者也觀察到來自不同地區的藏人，彼此具有差異的「藏語」（如語調、用語）、飲食習慣、生活經驗，以及可使用的語言種類，如何成為互動過程中區別或相互支援的部分。在中國藏區生活較久的藏人，講話多半帶著比較濃厚的方言口音，常會被在印度出生者形容為「講著很重的藏語」；除此，他們多習慣到中國超市購買食材，煮食與飲食上也較傾向來自區域的地方料理（如四川）。在印度生活較久者則習慣用手吃飯，煮食時會加入多種香料，三餐多為扁豆咖哩（dal）、印度餅（paratha）等，搭配甜奶茶，平常也喜愛看印度的脫口秀節目或電影。而在語言能力上，多數在印度出生或長大者，都具有基本的英文讀寫與會話能力；而在中國出生或長大的藏人，尤其是年紀稍長者，多半無法進行英文書寫或溝通，這也使他們在身分申請與日常生活中遭受到較大挫折，如拉莫就曾提到，當她還在等待身分面試時，有幾次在區公所的辦公室遇到來自中國的藏人，請她幫忙表格的填寫及回覆承辦者一些文書資料的問題。但在另一方面，多數在中國生活較久的藏人，由於幾乎都具備基本中文溝通的能力，反而讓他們在法國更容易找到中國餐廳或旅館的工作。⁴⁷

這些生存工具、資源網絡及生活慣習的差異，除了成為來到法國的藏人難民一開始區別彼此的面向，也透過生活互動，形成一種內嵌於日常、時隱時現的界線。筆者曾在一頓受邀參與的午餐中，深刻感受來自不同地區的藏人，如何在日常的互動過程中，透過語言切換，有意、無意地進行界線的劃分與轉換。2018 年夏天的田野中，筆者與拉莫一家受邀到達娃的鄰居貝瑪家午餐。貝瑪來自北印度的 Manali，其男友尼瑪在法國海岸熱門景點的一間中國餐廳工作。年紀約五十多歲的尼瑪，在中國藏區生活到二十幾歲才離開，曾在北印度的山區讀書與工作，十幾年前來到法國。尼瑪吃不慣印度的食物，也由於在中國餐廳工作，日常的煮食料理多為中式。這天的午餐即是由他料理的中式餐點。語言上，尼瑪可以說非常流利的中文，除了藏語，也可用北印地語（Hindi）進行日常的基本溝通，但完全不諳英文。由於尼瑪日常所處的環境除了以中文溝通的工作場域，就是藏人為主的社交圈，因此雖然已在法國生活超過十年，但尼瑪對法語幾乎一竅不通，平常在外的溝通，多半是依賴來自印度的藏人女友貝瑪。

當天的午餐參與者除了我、達娃、貝瑪、尼瑪及拉莫一家，還有貝瑪自印度來訪的表哥。午餐過程中主要使用的語言為藏語，然而，尼瑪在與我對話時，都會轉換成中文（其他人多半聽不懂）。午餐期間，當尼瑪離開餐桌到廚房準備其他料理時，達娃忽然

指著沙拉碗中一顆顆完整的小蕃茄，以英文詢問貝瑪：「為什麼沒有把它們切開？」貝瑪也用英文回答，表示是「他」（尼瑪）說不需要切開。看到我在旁邊疑惑的表情，兩人大笑著對我說：「他聽不懂英文」。除此，當天的午餐偶爾也參雜法語，主要發生在幾個大人與小孩的對話間。⁴⁸ 而有時，當幾個大人討論著不想被孩子知道的話題（如是否需要去超市採購飲料），也會忽然轉換為北印地語。

短短的一頓午餐，即呈現出多種語言如何在有意、無意的轉換中，凸顯（或消弭）人我之間的差異界線。當尼瑪與我說著中文時，或當達娃與貝瑪說著英文時，甚至當語言轉換為法語或北印地語時，都在看似「相同」的藏人間，劃出因生長、生活背景與不同世代而凸顯的差異界線，呈現在來自中國藏區與印度屯墾區的藏人間，也呈現在移居法國的第一代與第二代間，以及他們與還生活在印度的親友間。而當飯桌上的大家用藏語快速地交談，我在旁邊聽得有一搭沒一搭時，語言也再次劃出了非藏人的我與藏人間的界線，不論是來自哪個區域的藏人，都在這個「藏語」所劃出的界線中形成了相似的一群人。

除了逐漸形成的新的社會關係，多數藏人的生活裡，還有一部分重要的關係實踐是「跨國」的，包含遠方親友以及宗教或教派的網絡關係。⁴⁹ 大部分在法國的藏人難民，都有其他親屬分布在不同國家，他們之間除了會直接以撥打電話的方式聯繫彼此，近幾年來更常是透過社群平臺（如 Facebook、WhatsApp、WeChat），以訊息傳遞、網路電話、視訊通話等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近況。而當家人分散在超過兩個以上的國家時，同時進行的多方視訊，也常見於藏人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拉莫及頓珠，他們除了在印度的父母，也有不少兄弟姊妹在北美，拉莫與自己的姊妹幾乎每天都會視訊，分享彼此的工作狀況與生活細節，孩子也是透過視訊與另一頭的表兄弟姊妹及阿姨、叔叔們對話。

3. 新的族群互動經驗

本節前兩部分呈現了藏人難民在法國的生活感受，以及在此延續或新發展的社會關係與社群網絡。在這些面向之外，新的跨族群互動經驗，也是構成藏人法國生活的重要部分，許多人甚至在互動過程中反向強化了自我的藏人認同及作為難民的身分處境。

首先，許多藏人在身分申請的第一個階段—排隊等待進入區公所的過程中，即會開始意識到其他「難民」社群之存在，對此，拉莫與丘頓有這樣的觀察：

那裡有很多非洲人和穆斯林，他們都很高大，在排隊時總是會推擠我們，所以我們很難排到第一個。（拉莫，巴黎，2016年7月19日）

很多穆斯林與非洲人都會在那邊（區公所外）睡一整夜，並不是只有藏人。那裡有非常多的難民，我們以為藏人已經很多了，但那裡（區公所外）的難民更多。...我們藏人不會說法語，但大部分的非洲人都會，即使他們是新來的。他們常常與保全人員發生爭執，有時候表現得太過度，顯得很好笑。我們藏人總是遲到（比人家慢）。（丘頓，巴黎，2018 年 8 月 1 日）

拉莫與丘頓的敘述呈現出她們如何在等待的過程中，意識到藏人以外的其他難民，並在觀察、交談或實際的互動中開始產生「我群」與「他者」差異之認識與感受，如外表、語言以及社會性格。在她們的觀察裡，非裔難民與穆斯林社群的體型較為高大，有著不同的膚色與宗教信仰，許多人都會說法語，相較於亞裔面孔、瘦小、不諳法語的藏人，常在身分申請的第一關取得優勢（在排隊過程中取得優先位置，在文件填寫與溝通上也較為容易）。

除此，在談到底護申請的面談過程與結果時，不少人也會強調藏人因「沒有國家」、「政治難民」身分，以及「和平」的形象，較不會受到刁難。拉莫曾這樣解釋：「藏人與其他人（難民）不同，很少有國家拒絕我們，或對我們有敵意，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們本來就沒有國家，我們是不得已的（“we have no choice”）」。⁵⁰ 這個「沒有國家」與「政治難民」的身分表述，除了透過底護申請的過程不斷被強調與確認，也呈現在藏人日常與其他難民的互動中，如法語課。難民與獲得次要保護資格的申請者，在取得居留許可後，即可申請學習法語的課程。這樣的語言課程，也使藏人與其他難民或以類似身分居留者有更多接觸。達娃有次提到她在法語課的經驗，當時課堂正在談論不同文化社會的差異，一位男性穆斯林同學隨即提出：「我們都是難民；在這裡（法國），我們都一樣」（“We are all refugees. We are same here [in France]”），認為大家不應太強調區分彼此，想不到達娃馬上出聲反對，站起來強調藏人與其他國家的難民不同（“I told him no, we are not the same”），並指著地圖對那位同學說，你們都可以在地圖上指出自己的國家，但上面並沒有藏人的國家，我們是沒有國家的人，跟你們不一樣。達娃笑著說，她當時不知為何非常生氣，後來那位同學每次看到她都小心翼翼。⁵¹

語言課除了作為藏人表述自我身分處境，或區別「我群」與「他者」的場域，也讓他們有機會接觸並理解不同文化社會的家庭、性別與宗教面向。拉莫在法語課程中發現，許多非裔居留者雖可流利地以法語對話，但書寫與閱讀較困難。部分藏人則因為會英文，辨識法語的單字及書寫上較容易，但在發音與對話上遭遇挫折。除此，拉莫也在課程中認識許多來自北非的穆斯林女性（多來自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及突尼西亞）。筆者拜訪

巴黎期間，拉莫常在回家後，與我分享同學與老師在課堂的討論，如，這些女性來到巴黎的經過，以及她們原生社會的家庭關係、婚姻與文化特色。⁵²

除了身分申請及語言課程中的人群往來與比較經驗，有些藏人則是在工作中建立與其他社群的互動關係。拉莫的朋友德謙，是她搬家前的鄰居，筆者 2018 年初進行田野時，拉莫剛好受邀到德謙家參加小孩的慶生會。德謙在巴黎市郊的巧克力工廠工作，聚會時，她提起了工作過程中的遭遇。德謙是工廠雇工中唯一的藏人，其他同事多為菲律賓人，德謙比劃形容著其菲律賓同事出神入化的工作速度，但也因為她手指的靈活度無法趕上，包裝速度較慢，常成為同事們排擠、甚至取笑的對象。德謙說她一直在苦思自己一個人要怎麼面對其他人聯合起來欺負她的狀況，直到有次實在受不了，她在休息時，忽然拿了一把剪刀把頭髮剪亂，然後開始大聲地對同事們說，每個人都是因為需要工作才來到這裡，她還有三個小孩要養，已經很辛苦，沒有必要在工作時受氣，如果有人對她不滿，請直接說，或是要打架也可以，「我們藏人」（“We Tibetan”）從來不會怕輸，如果有人還是對她有意見，她願意找主管來，讓他做決定。德謙笑著說，在這之後，沒有同事再找她麻煩，看到她都閃避得很遠，非常怕她，「可能覺得我瘋了」，德謙補充說。⁵³

德謙在敘事中，不只一次強調「那些菲律賓同事」工作速度之快，令人難以想像，但也同時提到她們「不好」（“not good”）的態度與個性，並在生氣的話語中強調「我們藏人」，呈現出一種我群與他群相對、甚至對抗的氛圍。這個以族群集體的身分凸顯自我的表述方式，也常出現在許多其他藏人的日常對話裡，⁵⁴ 展現說話者試圖透過「我群」概念強調與「他者」的區別，在德謙的例子裡，不論其工作場域中的碰撞是否與族群身分有關，但在德謙公開表現其對抗的展演過程中，透過「藏人」身分的強調與區別，似乎也讓這個「我群」身分更加真實與深刻。

除了法語課及工作場域，多數藏人與其他人群的接觸與往來，主要是與周邊鄰居在共同生活區域的互動，如社區中的公園、休憩場所，或孩子學校的老師及其他家長。大部分藏人獲配的居所，都是在穆斯林社群為主的社區，然而，就筆者的觀察，多數藏人與周邊非藏人鄰居的互動都相當有限，多半僅是在公園或路上見面時相互點頭、打招呼。在公園或休憩場所時，雖然孩子們會玩在一起，但穆斯林女性多半會集中在一起聊天，藏人父母或媽媽們則會坐在相對有距離之處。筆者在田野過程中，僅觀察到達娃與一位法國鄰居有較頻繁的互動。這個住在達娃樓下的法國老太太，年輕時曾去過西藏，非常喜愛藏式酥油茶，她常到達娃家作客聊天，每次她一來，達娃都會以酥油茶招待她；兩

人的互動非常頻繁，達娃及朋友生活上遇到的問題，如一些生活文件的填寫與申請，甚至如何預定計程車到機場等，都會請教這位老太太。法國老太太也在與達娃家的互動中，學習到一些藏人食物的用語。

至於出生或成長於法國的第二代，多半會從學校教學、同學及鄰居玩伴間，認知或學習彼此文化族群身分的差異。這些交雜著文化、族群與國家公民身分的概念，有時會讓這些移居藏人的第二代困惑於自己到底是誰。如，拉莫的小孩（約十歲）就不只一次在回家後詢問父母，他是藏人還是中國人（學校中有些孩子會稱他為中國人—Chinois），或，他是藏人還是法國人。拉莫與頓珠好幾次向他解釋，說「我們」是藏人（*bod pa*），也是法國人，但不是 Chinois。⁵⁵ 再如，達娃有次在大夥聊天時，提到兒子（約十五歲）回家時問她，什麼是 Ramadan（齋戒月，伊斯蘭信仰者的節日），甚至抱怨為什麼其他同學都在過 Ramadan，而他們家沒有？達娃只能跟他說，那是穆斯林的節日，藏人也有自己宗教禁食（fasting）的方式，例如在每月滿月的那天。然而，達娃也開始擔心，孩子之後可能只知道 Ramadan，而不會知道藏人有什麼重要的宗教節日與習俗。

達娃的擔心在那場聚會中，引起了其他幾位媽媽的共鳴，幾個媽媽半開玩笑講著，應該在暑假把小孩送到印度的寺院或藏人學校學自己的宗教及語言。在那之前，大夥還在稱讚貝瑪的小孩，雖然是在出生後才到法國，但講的法語比其他（藏人）小孩都好，「就跟法國人一樣」。當時，貝瑪有點無奈地提到，她的小孩已經不大會說藏語了，很多時候跟他溝通都要用法語，勉強講的藏語也常令人聽不懂。這樣的擔心，筆者偶爾會在藏人媽媽們的聚會中聽到。⁵⁶ 這些在法國長大的第二代，長大後會如何看待或敘述自己的「藏人」身分，值得持續觀察。

五、移動、離散與跨國：藏人新世代的流動與社群經驗

（一）「移動」的敘事與實踐

如同本文一開始所提及的，對許多還在印度或已遷移至法國的年輕藏人而言，移動的目的，不論是離開中國藏區到尼泊爾、印度，或是從南亞再到法國，似乎都是在追尋一個「較好」的生存環境以及體制內較為明確的身分分類（包括體制化的難民身分或國家公民身分）。這個相對「較好」的概念，除了多是立基在族群文化處境所帶來的教育、身分與經濟生活的比較，也呈現出多種因素的取捨與協商。其中，許多在小時候離開中國到印度者，多半是因為家人希望讓他們在印度的藏人學校或各教派寺院接受教育（包

括藏語、族群文化與宗教傳統的學習)。而部分在年紀稍大(青、壯年)才離開中國到印度,或輾轉到法國者,則多是經歷了政治環境對其族群身分或文化處境的打壓或限制(如宗教實踐)而不得不離開。

筆者幾年前,曾遇到一位隨工作團隊從中國出國的藏人女性卓瑪,⁵⁷ 她的弟弟在尼泊爾工作,哥哥則是自小就被輾轉送到加拿大。由於知道藏人身分出國不易,筆者詢問了卓瑪這趟旅程是否遇到困難,卓瑪表示,因為是隨工作團隊一起,較為容易,但出國的申請也花了將近半年才獲得許可。談話中話鋒一轉,她頗感慨地說起藏族的 ID 卡大概是難用的卡,在中國境內旅行移動時,住旅館經常被拒絕,卓瑪提到,很多賓館人員在看到藏人的 ID 卡後會直接說:「我們沒有權力接待外賓」,「我們(藏人)變成外賓了」,卓瑪無奈地說著。即使在拉薩,如果藏人 ID 的號碼不屬於拉薩本地,也常會被當地旅館拒絕入住。由此,卓瑪也進一步提到藏人出國的種種限制,尤其是有家眷者,不論是參加研討會、公務活動或私人行程,皆無法帶著家人一起出國,夫妻當中必須有一個人留在中國境內。⁵⁸ 也因此,哥哥到加拿大後,除了網路視訊,再也沒有見過卓瑪及其他還在中國的家人們。⁵⁹

卓瑪的這些感慨與無奈,委婉點出了許多藏人在中國的處境及想要離開的原因,也再一次呈現出,分散在不同國家、跨國的親屬網絡已經成為許多當代藏人生活的常態,不論他們是生活在中國藏區、尼泊爾/印度或其他地方。卓瑪的談話也讓筆者開始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移動」對當代藏人的意義。在中國,藏人因其族群身分而受到種種移動的限制;在印度,藏人則因客居的身分,在境內與國際的移動常遭受到許多限制與困難。⁶⁰ 這些因其身分而產生的關於「移動」的困境,除了在經驗與敘事中成為意義化藏人身分處境的重要過程,似乎也反向強化了藏人對「移動」的渴望與期待,使之成為他們表述生活意義及想像「外面」世界的重要面向。除了在想像上預示著生活與身分改變的可能,「移動」也在實踐過程中,成為許多藏人突破既存環境規範與身分限制、體驗不同世界及創造新的連結,非常重要的能動力。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關於「移動」的想像、期待與敘事,充滿在流亡藏人日常的書寫與對話中(Swank 2014)。而對於踏上旅程前往法國者(如丘頓、諾拉與拉莫),旁人聽來充滿風險與未知的移動過程,對他們來說,則因充滿新的事物與經驗(異國飲食與文化、第一次搭飛機、第一次坐小船)而記憶深刻;甚至,對於在法國因語言及生活受挫而不適應者(如諾拉),再一次改變現狀的移動,在想像、陳述與實踐上,似乎都是非常自然、合理的過程。

由此可見,即使到了法國,「移動」的敘事也持續在藏人難民的生活之中發展,除了

移動經驗的分享，身分不同階段對移動範圍與便利性的影響，更是常在法國藏人的日常對話中聽到。如，諾拉 2018 年與筆者見面時，好幾次提起因想念家人，想回印度一陣子，但因還在等待居留文件而無法移動。直到身分證件都已辦理完畢，諾拉才申請了回印度的簽證。然而，由於法國居留身分所申請的護照仍屬有限制的旅行文件，⁶¹ 申請印度簽證時，除審查時間較長（約一個月），簽證效期也較短（僅一個月）。諾拉回到印度後，曾希望能延長簽證的停留時間，但仍困難重重。

許多藏人獲得法國的居留身分後，也都會申請簽證回印度參加宗教活動，或帶著家人回去拜訪親友。達娃在幾年前就曾帶著兒子回到印度，當時剛好是暑假期間，達娃原本希望能在印度待上兩個月陪伴父母，但因身分限制無法申請更長的簽證，使她常在對話中感嘆，即使存錢存了很久，回印度一趟也僅能待一個月。相較於達娃的感嘆，已獲得法國公民身分的拉莫，則不只一次地向筆者及其他藏人朋友強調，公民身分讓她在「移動」上更方便了，不但去美國拜訪家人很容易，帶孩子回印度時，申請簽證也相當快速。

對大部分還未成為法國公民的藏人而言，雖然跨出歐洲的長程移動不容易，但因擁有法國的居留身分，他們可以相對容易地在歐盟國家間移動，許多已取得居留權的藏人僧侶，即是以這樣的身分，至歐洲各國的宗教中心進行講經與教學，建立教派的會眾網絡。至於非僧侶者，也常會在較長的假期中到周邊國家訪友或旅遊。

對許多藏人而言，移動代表著衝破既有限制、讓生活得以改變。「移動」的限制及其所關聯的族群文化處境之敘事，形塑了藏人在中國與南亞的身分意義，「移動」也成為他們改變身分與生活現況的重要方式。除此，「移動」所帶來的身分與生活之變化，及所連結的更多可能性，也都在藏人的法國生活中持續作用。上述那些在移居藏人的生活中持續被談論、比較的移動經驗及其與身分轉變的關聯性，呈現出不同身分狀態（在中國治理下的藏人身分、在印度的藏籍客居身分，以及在法國的難民居留身分與公民身分）所對應的「移動」之難易程度、「移動」範圍與「移動」的便利性。這些連結著不同國家對象的身分關係及差異的感知與經驗，成為藏人們論述其身分發展及實踐跨國關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不斷為當代藏人社群的連結與想像，帶入新的元素。

（二）「成為難民」與「做難民」

在印度，我們是外國人，那裡的生活沒有希望... 法國人對待藏人非常友善，他們知道我們是難民。（拉莫，巴黎，2016 年 7 月 20 日）

拉莫與達娃等人曾不只一次強調，在印度，生活沒有「未來」，藏人永遠都是一個

「外國人」，可是在法國，孩子們之後會有法國國籍，他們可以決定要生活在哪裡。⁶²如前所述，藏人在印度凍結般的「外國人」身分與生活處境，讓許多出生或逃亡到印度的藏人，表達出生活停滯沒有進展、沒有未來或沒有希望的觀點。

與印度不同的是，在法國，藏人的身分不再是曖昧不明、無法被清楚置放的游離狀態，而是被明確地歸屬在「難民」類別中，不但可由此獲得國家給予難民的權利與保護，也擁有進一步成為公民的可能。除此，不同於在印度時藏人並不需要時時刻刻確認或表述自己作為流亡者的過程與作為難民的處境，⁶³在法國，這些藏人幾乎是在落地的那一刻起，作為「難民」及作為「藏人」的身分，即開始被不斷地述說、呈現與確認，不論是在區公所外等待身分登記時，或是身分審查所經歷的各個階段，抑或是生活中的各種社會關係互動。這些藏人透過一次次的書寫與重述，說明自我或父母逃亡、流亡的故事，解釋自己為何成為難民、為何來到這裡。透過表述與自我呈現，他們一再經歷（並展現）自己及「我群」「成為難民」的過程，也不斷確認流亡、沒有國家的難民經驗與藏人身分互為表述的關係與意義。這個不斷透過述說與實踐強化的身分經歷及過程，讓「難民」的意義變得更加具體且真實，並逐漸形成一種既內化又外顯的身分感知。

在這個「成為難民」與「做難民」的過程中，關於「藏人難民」的敘事與經驗，融合著個人的生活經歷、經驗感受，以及族群身分所指涉的命運與更大的歷史過程，不斷被述說、展演與實踐，也讓來到法國的藏人第一代，持續強化他們作為「無國家難民」的意識。每年三月十日左右在巴黎舉行的紀念藏人拉薩起義遊行，筆者認識的藏人朋友幾乎都會參加，有孩子者也會帶著小孩同行。透過公開、針對藏人流亡命運與難民身分的展演，在法的藏人難民不但向自己的孩子訴說著作為藏人流亡、離散的命運，也在向法國社會展現藏人不同於其他難民，出生即為難民的族群命運。

整體而言，來到法國的藏人，在此護申請與生活中體會到「難民」身分被逐步有系統地制度化確認與安置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讓藏人流亡命運的論述透過官方（國家）給予的身分認定而再次確認，另一方面，難民身分的確認也成為藏人進入這個新的國家體制的第一步。對一些藏人而言（如拉莫與達娃），即使在成為法國公民後，身分證件的類別從「難民」轉變為「公民」，⁶⁴但他們在講述自我的藏人認同時，仍會以生來即無國家以及作為難民的命運來強調藏人不同於他人的族群特色與身分處境。如同 Hess 在探討移居至美國的藏人時所觀察到的，許多藏人在獲得美國公民身分後，仍會以難民（refugees）及無國家（stateless）描述自己的身分，呈現出公民與無國家身分並置的認知（Hess 2009: 225-226）。

（三）離而不散？：社群關係與跨國網絡

筆者在前文已指出，在法國的藏人難民並非同質的一群人，他們會相互區辨來源地與成長環境、語言語調的不同，也經由接觸與互動持續產生的差異感受，在不同情境與場合中呈現彼此的區分。然而，「藏人」（*bod pa*）概念所形成的網絡，還是具有某種相互連結、可觀察辨識的內聚力，甚至成為「社群感」或「社群意識」連結與凝聚的基礎，如同達娃有次說的：「藏人會相互幫忙」。⁶⁵ 除了達娃，拉莫與丘頓等人也都曾提到，在申請身分的過程中，新認識的藏人朋友不但會分享各階段需注意的事項，也會相互協助語言的溝通、提供工作資訊，拉莫甚至還讀過大家傳閱的「面試祕笈」。這個透過語言及「藏人」身分聯繫起的「我群」網絡，提供了在法國藏人難民生活資訊與情感歸屬的支持，也成為他們理解、想像與交換新生活中各種資訊及經驗的重要媒介。

根據筆者在本研究田野中的觀察，來自中國藏區與印度屯墾區的藏人，在法國的互動關係似乎比在印度時融洽且密切。在印度，出生、成長於中國的藏人，與在印度出生、成長者，在生活中常會形成相互有別、甚至刻意保持距離的關係界線（有時甚至會呈現出某種衝突關係）（Liu 2012, 2018; Swank 2014; Thapan 2016），當然，這與印度政府對待他們的差異態度以及不同身分處境息息相關，⁶⁶ 加上兩者對印度生活的熟悉度、適應性及語言使用之能力皆不同，都讓他們的差異背景在印度的日常生活中不斷被強化及感知。這些透過語言、身分處境以及日常互動不斷加深的群內差異界線，讓部分到達印度的新進流亡者，有時會感受到自己在藏人社群中被進一步「他者化」或邊緣化。⁶⁷

然而在法國，多數來自中國藏區與印度的藏人即使彼此仍因生活經驗與成長背景的差異而存在區別，但在日常生活中（如往來、聚會，甚至交往成為伴侶），似乎沒有形成顯著區隔的互動界線，反而是在互動中對彼此的差異或特色，有了新的認知及體會，除了偶爾會用戲謔方式相互取笑，共同作為「藏人難民」在法國的生活，也讓他們逐漸發展出新的共同語彙（除了彼此語彙的影響，法語的一些用詞，如食物、交通工具等，也逐漸滲入藏人的日常對話中）與生活經驗。對此，貝瑪及拉莫都曾提到，因為在法國「我們都一樣」（“we are the same”），在這裡，藏人不論來自何方，都面對著同樣陌生的新環境。拉莫解釋，這與在印度時，她相對於來自中國者，對印度的環境較為熟悉、覺得屯墾區像是她的家的感受是不同的。也因為這樣的差異，她在印度有時會用「我的地方」（“my place”）看待自己與屯墾區的連結，而將來自中國藏區者視為「外來者」（“outsider”），覺得他們脾氣不好、講話較直接，常會引發爭執或口角。⁶⁸

雖如此，不論是貝瑪或拉莫，她們在印度並沒有與來自中國的藏人有許多接觸及互

動的機會，上述的刻板印象及感受，有些是聽親友說的，有些則是透過間接的觀察與猜想。貝瑪也強調，這樣的印象，在她遇到尼瑪後發現不一定是真的（尼瑪在藏人友人間以溫和的脾氣著稱）。由此可發現，印度的屯墾區生活，雖然讓一代代延續的藏人持續凍結於流亡的狀態與客居的身分，但也讓出生或成長於其中的藏人，發展出一種黏著於屯墾區、卻又不固著於印度土地，如泡泡般游離的歸屬情感。這樣的連結讓他們在印度面對來自中國藏區者時，有時會自然地將彼此在語言、習慣及生活適應上的落差轉化為性格與習性特質的差異詮釋。而當藏人來到法國，這樣的現象因接觸與互動頻繁，加上面臨同樣的生活困境與「他者」身分，彼此間作為「藏人難民」的共同感大過於生活習慣及語調、詞彙使用的差異，因而展現出某種相互連結與凝聚的關係感受。⁶⁹

除此，許多移居至法國的藏人難民，也還維繫著與南亞藏人社群緊密的關係及互動。有些人會不定期回印度或尼泊爾拜訪親友；當所屬教派在尼泊爾或印度的寺院舉辦重要儀式慶典時，歐、美地區的藏人除了透過捐獻參與，也常會帶著家人一同去參與。另一方面，當教派中重要的僧侶到法國進行講經或祈福法會時，在法國的藏人也多會前往參加。⁷⁰ 這些參與過程都讓在各地以不同身分居住或生活的藏人，有機會感受或意識到自己與其他離散「我群」的連結，不論是「藏人」的概念或教派社群的身分，都在這些活動中有機會產生更進一步的凝聚與確認。⁷¹

六、結論：從「沒有國家的人」再省藏人年輕世代對「更好的生活」的追尋

西藏是我們的國家，但在哪裡可以找到它？當其他人可以指著世界地圖展現他們的國家時，我們無法。...我們現在沒有自己的護照與土地，無論我們去到哪，都必須依靠其他國家來生存。但即使我們成為那些國家的公民並取得它們的護照，它們仍然不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知道自己不屬於它們，這個沒有國家的命運將伴隨我們一生。...

這只是一種生存方式，我們無法生活在我們宣稱作為國家的西藏，但至少可以選擇另一個提供我們更好生活的國家。事實上，每個國家對我們來說都一樣，不同的只是它們的生活條件。（索南，北印度，2008）⁷²

索南是筆者在 2007 至 2009 間於北印度進行田野時的受訪者之一，當時三十多歲的他，在各大城市間進行地毯與毛衣買賣。這段對話來自筆者詢問為何許多出生在印度的

年輕人想移居海外，索南先是強調對藏人而言，沒有所謂海外或國外（“abroad”）的概念，因為所有國家對他們來說都是異國（“foreign country”），包括印度。既然如此，為何已經生活在印度或尼泊爾的藏人還是努力嘗試向其他國家移動？對此，索南在後半段的談話中表示，這些「國家」對他們的重要性，只在於是否能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與環境。至於成為哪個國家的公民，對藏人來說並沒有身分認同上的意義。從他的觀點，藏人不不論是選擇居住在哪個國家、成為哪個國家的公民，都還是「沒有國家的人」，這不但是出生時已存在的狀態，也是將背負一輩子的命運。

Fiona McConnell (2011, 2013) 在其研究中指出了印度藏人身處的多種關係政治及處境的複雜性：即，同時作為西藏流亡政府眼中的「公民」、印度政府口中的「外國客人」（foreign guests）與國際組織論述中的「難民」，該三種身分的界線協商與論述角力，共同構築了藏人在日常處境裡關於「國家」的各種經驗。當時索南的這段話，讓筆者開始嘗試從不同角度觀看許多藏人年輕世代想辦法往南亞之外移動的現象。也是這樣的觀點，驅使筆者在這幾年來持續關注並試圖理解藏人新世代想像、描繪的「更好的生活」之藍圖，希望進一步瞭解這種一方面將自己區隔於現有國家概念及分類之外，另一方面又試圖透過取得某些國家的身分而生存的矛盾。

本研究中的拉莫與達娃，在談論或面對法國的其他難民時，都曾強烈表示，藏人是沒有國家的人，與有國家但回不得的難民是不同的。不論是索南、拉莫或達娃，在解釋中都透過藏人的國家認同（對不存於今日國家分類中的「西藏」的歸屬渴望）無法被安放於既有分類中，強調自我身處於國家體制之外的「例外」狀態。筆者認為，這種對於現有國家分類及體制的否定與區隔，顯現出部分年輕藏人對於宰制今日大多數人生活的國家身分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規範、限制與排除的某種抵抗，以及他們既抗拒又無法完全置身於其外生存的矛盾感受。

James Clifford 與 Liisa H. Malkki 在針對離散現象與難民社群的討論中，都指出了流亡與離散人群在概念化身處的情境與身分認同時，往往呈現出既要跳脫「國家」體制又無法擺脫其制約，且仍舊陷入國家的語言與人群分類系統中的矛盾(Clifford 1994; Malkki 1995b)。Malkki 用「闕界」（liminal）來形容難民脫離國家秩序，身分所呈現的游離與等待過程，面對這樣的狀態，她發現集中居住在難民營者（camp refugees），會透過族群身分的歷史敘事展現原生認同無法被安置、進而否定當下國家秩序的有效性，並透過強化難民認同來維持自我的族群邊界。而分散居住在城鎮者（town refugees），則傾向於將國家秩序視為一種非原生、可利用的身分工具，因而展現出積極建立各種社會連結、

彈性且多樣的認同表述 (Malkki 1995b)。Malkki 的研究指出了被迫脫離國家秩序、身分處於游離狀態的難民，會因所處環境的差異，展現出兩種不同的生存策略，一種是將族群認同與土地的連結視為原生、單一，應與國家邊界相符的存在，並透過當下該國家事實的缺席，強調等待的目的與難民身分的意義。另一種則是多邊界、彈性的認同策略，強調更利於當下生存環境的關係連結與身分表述，國家秩序在這樣的脈絡裡，成為可以被操作、利用與改變的工具性存在。

而在本研究中，今日的許多藏人年輕世代，雖然無法讓自己超脫國家的語彙及體制而生存，卻透過將國家概念區分為本質化的原生認同以及「可取得」、「外加」的身分類別，一方面否決當前國家分類體系的適切性，呈現自我原生認同無法被有效安放、成為「沒有國家的人」的處境與命運。另一方面，則是將可取得的國家身分視為一種生存資源，透過尋找「更有利」的國家身分及「更好」的生活環境，持續意義化自我的身分處境與生存策略。如此的身分敘事，也呈現出對許多從印度再移動到法國的藏人難民而言，「更好的生活」不只是經濟生活的比較，更重要的是，追求一個可以讓生活有「進展」（可以選擇與改變）、擁有更多機會及資源的國家身分。而當這樣的國家身分必須透過強化自我作為難民的處境作為進入體制的第一步，我們即可看到難民意識如何透過具體顯現的行為、行動與敘事，成為這些移居藏人區別我群與他群、強化藏人認同非常重要的基礎。

由此也可發現，在當代許多藏人年輕世代的表述與行動中，國家身分 (nationality) 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型態，一種是對應於族群認同，具有族群性的國家意識，無法被取代與替換，也因此，一旦失去，將無法復得，藏人就只能永遠作為「沒有國家的人」，僅能透過族群身分展現彼此的關係與連結。另一種是在後天的生活中，透過公民身分而「取得」的國家身分，作為一種生存的工具或資源，可以改變與更換，也可以依據其功能及作用而被比較與排序。筆者在印度、尼泊爾或法國田野中遇見的藏人，提到親友或他人移居其他國家時，多數都會以他們已取得該國身分證件或護照的用詞來表示，少數會以成為該國公民為形容，而不是以他們已經成為德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表示，⁷³ 似乎在表述中顯現出一種與這些國家身分及連結保持著某種距離的區隔。或許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區隔與距離感，讓這些移動的藏人在看待移居的國家及取得的居留或公民身分時，將其視為一種提供「更好」生活（如更多的物質選擇、工作機會，優勢的教育環境與更容易的跨國移動）的工具或資源，當其無法滿足這些需求時，再次移動或轉換國家身分就成為下一步的生活選擇。也因此，部分藏人在移動到第一個國家後，會選擇再次移動，

並在陳述中展現對不同國家身分及資源、環境的比較（如本研究中拉莫對家人的未來規劃、諾拉對再次移動的努力，以及成功自法國移居美國的達娃鄰居的遠親）。換句話說，筆者在本研究的藏人（包括以客居身分生活於南亞者，以及自南亞向外移居的第一代）身上，觀察到了 Malkki 所提及的兩種身分策略，它們同時並存，一方面展現藏人跨國離散、國家／國族認同無法被安置的「闕界」狀態，另一方面也凸顯既有國家秩序作為一種身分工具，可被選擇、操作與更換。

從這樣的現象，本研究也發現，許多移居後的藏人會為在南亞的親友提供向外移動的資金、資源與人脈，讓看似自發、個人的跨國移動，進一步發展出更多元複雜且具策略性的網絡連結與關係互動。對於這個持續發展且跨越不同國家的遷移網絡及過程，本文在有限的田野時程及材料中，無法有更深刻全面的觀察及比較討論，但仍將持續關注，留待日後作為後續田野發展及議題延伸的基礎。

最後，根據本研究的觀察，作為第一代的移居者，藏人從中國到南亞，再到歐洲，這個不斷向「外」移動、從聚居的生活型態分離，轉而散綴在跨國的社會與城市間的過程，看似散離，卻似乎帶來了另一種重新結構、聚合的機會與能動力，讓來自不同地方的藏人，有了比以往更密切接觸、往來的機會。這也使得在法國因庇護申請以及生活互動而逐漸形成的友伴關係與共同感經驗，成為移居藏人情感連結、建立新生活的重要基礎，甚至讓過去透過想像或教育學習的彼此形象，因真實接觸而產生新的感受與詮釋，並在互動與差異的磨合中，不斷凝聚作為「藏人」、「藏人難民」與「在法藏人」的身分意義與生活經驗。至於這樣的互動為何沒有進一步強化過去對彼此的刻板印象，使得隔閡與衝突加深，反而似乎成為連結及關係深化的基礎，或如 Yeh（2007）在其觀察中所提出的，在移居藏人間產生各種關於藏人性（Tibetan-ness）的論辯，筆者認為，在本研究中，來自中國藏區及出生於印度屯墾區的藏人之間，彼此的差異及區隔仍在日常互動的過程中時隱時現，只是在面對法國社會時，共同的藏人認同會暫時（或逐漸）消弭兩者間的部分差異。⁷⁴ 至於這樣的連結感受是否真能持續，或僅是作為移居過程中某一個階段相互聚合的黏著劑，則還需要對藏人難民在法國的生活有更多面向且深入的理解，尤其是在此地出生的第二代，沒有背負第一代生活背景的差異，他們究竟會因此更趨相似而凝聚，或是逐漸融入法國社會、讓藏人認同的表述呈現出另一種樣貌，都值得進一步觀察與探究。

致謝

本文的完成，首先要非常感謝田野不同階段觸及的所有在法國、印度等地的藏人朋友們，沒有他們的參與和熱心協助，這個研究無法順利完成。惟文中若仍有缺漏不足之處，由作者全權承擔。除此，也非常感謝同事趙中麒教授在本文完成後的閱讀與建議，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點出本文書寫論述之盲點，使其更加完善、清晰。本研究的經費承蒙科技部支持（計畫名稱：「當代流亡藏人的跨國再遷移：以自印度移居法國者為例」，計畫編號：106-2410-H-260-020-MY2），尤其感謝。最後，要特別謝謝《考古人類學刊》編輯群細心且耐心的文字編輯與書目校對，讓本文更臻完善。

附註

1. 該次調查讓筆者初步理解藏人難民在法國的概況，也成為本研究聚焦、後續田野規劃非常重要的基礎。有關該次田野的部分紀錄，曾以〈「難民」身分的意義轉變：法國藏人家庭田野紀實〉發表於芭樂人類學（見劉增珊 2016b）。
2. 直至今日，出生於印度的第二與第三代流亡藏人仍是被以「外國人」身分看待，其居留證件（resident certificate）每五年就要延長一次，無法轉成永久居留，也無法申請成為印度公民。出生於尼泊爾者則面臨連居留證件都無法申請的更艱難困境。
3. 除了簽證申請比美國更為彈性且易取得外，半世紀多來在歐洲各國逐漸形成的綿密的藏人宗教網絡（包括各教派宗教中心的建立與信眾網絡的擴展），也直接、間接影響著許多藏人移居的選擇，如，有些僧侶在移居後，即是依靠這些既有的宗教資源與網絡建立在新社會的生計與社群關係，而部分非僧侶的藏人，則是透過家人中僧侶身分者的人際或資源網絡進行跨國移動。
4. 許多藏人是透過法國長期協助印度及尼泊爾藏人兒童的援助組織（如 Aide à l'Enfance Tibétaine, AET）而對法國產生嚮往。不少人自小就曾接受來自法國組織的認養協助，在往返的書信以及不定期的見面中，逐漸產生法國對藏人非常友善的印象，而這樣的印象，也在口耳相傳中被告知。除此，筆者認為，法國學術機構長期以來在藏學研究的發展，以及藏人各教派組織近幾年在法國不斷增加的信眾與宗教中心，也在法國社會中創造出一股友善藏人的氛圍。如，筆者在 2009 年到法國參加苯教與藏學研究相關的研討會時，不論是在南法的研討會現場或在巴黎，都不斷聽到在地法國人與藏人提到，法國是印度以外可看到最多雪山獅子旗的地方，

並以此強調法國是歐洲國家中對藏人最友善者。筆者對該現象並未有進一步的觀察，但從許多藏人的確都曾或仍受到法國組織與宗教信眾的認養協助，可推知藏人對法國並不陌生。然而，多數藏人向外移動的國家選擇還是會以在該國是否已有親友，以及簽證申請與移動路徑的難易程度為主要考量。

5. 除 2016 年的先行性田野外，筆者於 2018 年至 2019 年間共進行了四趟短期田野調查，分別為 2018 年 1 月 23 日至 2 月 22 日（法國）、2018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16 日（法國）、2019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14 日（印度），與 2019 年 7 月 1 至 25 日（法國）。除此，筆者於 2020 年初至尼泊爾加德滿都進行另一個研究主題的先行性調查時，也在談話與觀察中，對藏人跨國的親屬連結與社群關係有了更多面向的理解，這些持續的觀察都成為本文書寫與論述的重要基礎。
6. 印度政府對待移動入境內的難民或流亡者，在法定身分的分類以及權利規範上，皆是以 1946 年的《外國人法》（Foreigners Act 1946）與 1939 年的《外國人登記法》（The Registration of Foreigners Act 1939）為依據。根據這兩個法案，印度境內所有非公民皆歸屬「外國人」之範疇，印度政府擁有限制其（土地）所有權、工作權、自由移動權、言論權與集會權等之權力（Jayal 2013; Tibet Justice Center 2016: 7）。然而，在此「外國人」分類下，印度政府對待境內難民／流亡者的態度亦會依不同人群（如來源國、宗教、文化等）、不同時空情境等而有不同的政策作為（Ghosh 2016; Sharma 2009）。
7. 位於北印度達然薩拉（Dharamsala）的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簡稱 CTA，其舊稱為西藏流亡政府－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直至今日，許多藏人仍習慣以舊稱稱之），雖然看似作為管理印度境內藏人的主責單位，但並未獲得印度政府的正式承認，其施為的權責也都必須經過印度政府的認可與授權。
8. 針對 1950 至 70 年代間進入印度之藏人，印度政府是以分配土地（借租給藏人行政中央）的方式，讓他們建立屯墾區。
9. 在印度的藏人社群，常會把往其他地方（不包含印度、尼泊爾與中國）的移動稱為「到『外面』」（“moving ‘outside’”）。相同的，在歐洲與北美等地的藏人，也常會自認為自己「在『外面』」，例如，當筆者詢問過去在田野地中認識的朋友現在在哪裡，就常會獲得「他／她去了『外面』」（“he / she went ‘outside’”）的回答，細問後才會瞭解那些人是去了哪個國家（多是在北美或歐洲）。除此，筆者在與法國報導人的對談中，也常聽到他們用「我們這些在『外面』的人」或「我們在『外

面』...」（如，“We are ‘outside’ enjoying our life...”）來說明他們對還生活在印度的家人之責任與照顧。

10. 當然，札西也表達了希望自己有機會「出去」。他從未坐過飛機，但其在北美的一位非藏人姻親曾表示，結婚時會邀請札西去參加婚禮，因此札西好幾次半開玩笑地說著，下次應該就輪到他「出去」了（田野筆記，2019年2月7至8日）。
11. 早期的集體再安置計畫多發生於藏人流亡初始的1950年代與2000年間，最近一次專案再安置計畫則是在2010年，因藏人行政中央向加拿大政府請求協助，加拿大同意自2010年起的5年間，提供約1000個移居名額給印度東北邊境Arunachal Pradesh州三個屯墾區的藏人（見<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canadian-govt-sponsors-immigration-for-tibetans-in-arunachal/story-8nIFu6nkVKGodTfoBYijRI.html>，取用日期：2021年1月30日）。
12.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本文所討論的藏人身上，在法國，以藏人身分申請難民庇護者，都被歸為「中國的難民」（Refugie Chinois），必須填寫「中國」為其原國籍。
13. 雖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當代流亡藏人對於跨境（再）移動的想望或付諸於行動的實踐，但在僅有的少數文獻中，呈現出較深刻議題討論與長期觀察者，還是以在美國的藏人社群為研究對象者（如Hess 2009；McGranahan 2016, 2018；Yeh 2007。潘美玲在近期除聚焦自南亞移居美國者，亦加入對移居臺灣藏人的討論，見潘美玲2013、2016）。Gyaltag（2003）與Tethong（2003）針對歐洲藏人的討論，僅是概述性、以居住於瑞士者為主的介紹，且所關注的是相當早期的移居者。究其原因，可能在此再遷徙現象（即從尼泊爾／印度第一個移居地再往外的遷移）產生的時間過短，規模也不夠龐大，加上地點過於分散，僅有少數地區（主要在美國，見Hess 2009）的藏人形成小規模的聚居，使得田野的進行本身就不容易。
14. 除此，還有一些來自尼泊爾的藏人，他們大部分來自尼泊爾的藏人村落，擁有尼泊爾國籍，他們在藏人難民社群中常被稱為「尼泊爾人」，但當筆者進一步詢問這些人是否為藏人（Tibetans）時，則會得到肯定的回答，指稱者通常也會進一步解釋說，這些人也講藏語，但來自尼泊爾。筆者在2018年的夏天結束田野離開法國後不久，即在社群網站中看到一段許多藏人朋友分享的影片，該影片由一位在法國的藏人錄製，提到許多住在藏人難民帳棚區的「尼泊爾人」，打架鬧事、滋生事端，會影響藏人在法國的形象，呼籲在法的藏人們注意這個狀況。
15. 本文雖已對所有受訪者匿名，但為了去除相關者可識別的資訊，在不影響分析與論

述的前提下，將部分細節（如精確的年紀與到法國的年分）做模糊化處理。

16. 丘頓對這個仲介組織的運作型態如此描述：「該機構的負責人在泰國，它的運作方式如下：印度的仲介（agents）將我們送到曼谷，在那裡有另一個人會帶領我們。從曼谷到土耳其，是由一位馬來西亞人帶領我們，他負責我們所有的事。從土耳其到希臘，負責的是一個土耳其人」（巴黎，2018 年 7 月 31 日）。從丘頓及同行友伴視野所理解的仲介組織與運作方式，我們可看到該人力運送的網絡據點與參與人群跨越多國，類似的仲介網絡也可在其他入來到法國的經歷敘述中觀察到。
17. 當時諾拉已獲得難民身分的認定，筆者因此猜測她已能在歐盟各國境內自由移動。
18. 他們多半是透過仲介安排到法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的旅程，在支付了一定金額後，仲介會根據自身在不同國家的網絡及客戶的支付金額，安排移動的途徑與時間。根據許多人的說法，支付的金額除了與風險高低有關，也會影響移動方式（如，比起陸路與水路，航空花費相對較高），這筆高額的移動費用，有時是由家人支付，有些人則是向親友借款，也因此，部分藏人在抵達歐、美後，即需要快速尋找工作，以償還出國的高額借款。
19. 也有人透過包計程車的方式跨越歐洲各國邊界來到法國，如頓珠的親戚。頓珠是拉莫的男朋友，我與拉莫則是認識許久的好友，拉莫與頓珠在 2008 年至 2009 年間來到巴黎，頓珠的一位親戚則是在幾年後，與另外兩位朋友從德國租了計程車到法國，該過程由拉莫口述，呈現出另一種跨越邊境之旅：「他（頓珠的親戚）與朋友共三個藏人以 700 歐元租了一輛計程車到法國。不幸的是，當他們一跨越邊境進入法國，就被警察攔下來，警察把他們帶到警局...他們（三位藏人）知道法語的難民怎麼說，就叫著 *réfugié*，警察給了他們一些食物，並扣留他們。後來，在找來一位藏人翻譯後，警察問他們要去哪裡，他們說巴黎。警察問巴黎有人可以幫助他們嗎？他們說有，就是這個時候我們（拉莫與頓珠）接到了藏人翻譯的電話，他說你們的朋友被抓了，可能會被扣留 24 個小時，但不用擔心。之後，警察帶他們到火車站，協助他們買了車票，那位藏人翻譯又再打給我們，說你們的朋友在路上了，記得去車站接他們」（拉莫，巴黎，2018 年 2 月 7 日）。從拉莫的敘述可知，頓珠的親戚與友人在進入法國後即被警察攔截，並帶到警局，幸運的是，雖然語言不通，最後仍然順利來到巴黎，並在拉莫與頓珠的協助下展開庇護申請。
20. 至於移動所需的資金，除了由家人全權提供外，不少人是向朋友、甚至遠親借貸而成行的。就筆者所知的幾個案例，這些借貸間通常沒有文字記錄的契約，多半是透

過家中兄長與親戚間通話或面對面的討論後而決定。如前述提及的札西，其兄姊之一前往北美的過程，即是向一位在北美及南亞間做生意的遠親借款，才得以支付旅程所需之費用。

21. 理論上，難民可向任何一個離自己最近的區公所進行身分登記，然而，各區受理機關申請流程時間的長短、面試官的友善與否、社會福利資源的多寡，以及區內相近族群的人數比例等都不同，這些都會成為難民們評估身分登記區域的因素。對藏人而言，多數人選擇在 Yvelines、Hauts-de-Seine 與 Val-d'Oise 這三個分區進行身分登記（這三區的區公所分別坐落在 Versailles、Nanterre 與 Cergy），根據受訪者的說法，除非有親友住在市區，他們很少會選擇巴黎市中心進行身分登記，因為申請人數過多，需要等待的時間非常長。許多人也表示，這三個分區因為藏人的申請者較多，區公所對藏人較熟悉也「較友善」（“more friendly”），加上流程進行時間較短，都是申請者眾的因素之一。
22. 申請人因此，除了庇護身分的申請表，還須填寫其他文件以申請住宿（申請文件會被遞交至 Centre d'Accueil de Demandeurs d'Asile, CADA）及健康保險（由法國健保基金負責）。
23. 不少人在一開始選擇身分登記的區域時，即會以長期居住為目標進行各分區比較，工作機會的多寡以及周邊是否有相同族群居住，都是比較與考量的重要面向。以達娃為例，她大約是在 2010 至 2012 年間來到法國的，由於已有家人居住在巴黎郊外，她在身分登記與分區選擇上，相對於其他藏人難民（或其他難民）獲得了較多的資訊與協助，並沒有經歷太多獨自摸索的過程。達娃選擇身分註冊的地點位於巴黎市中心與郊區的邊界，即是因為此地連結各式公共交通系統，進入巴黎市區或移動到法國其他地方都相當便利；然而，也因為此地交通位置優越，登記難民身分的人較多，使得她在一開始僅獲配多人房中的一個床位，而非單人房。達娃有時會提起她與同寢室的其他藏人們如何擠在小小的房間內煮飯、聊天，自得其樂。
24. GUDA（Guichet Unique de Demande d'Asile）作業模式的用意在於結合不同機關的相關代表，同時受理難民身分認定與社福資源的申請表格，希望藉由這個整合的平臺系統，簡化申請流程並縮短申請時間。
25. 為各 NGO 為申請庇護者設立的報到平臺，如，在巴黎的 PADA 主要由 France Terre d'Asile 主導。
26. 見 <https://www.asylumineurope.org/reports/country/france/asylum-procedure/access-pr>

[ocedure-and-registration/registration-asylum](#)（取用日期：2020 年 11 月 30 日）。

27. <https://www.infomigrants.net/en/post/8342/new-system-to-start-asylum-process-in-france>（取用日期：2020 年 11 月 30 日）。
28. 當筆者提起 PADA 報到以及電話預約的規定，藏人朋友中似乎都沒有人聽說過。即使各 NGO 的資訊平臺上都有詳細的流程說明，但對筆者接觸的幾位受訪者而言，他們自己及親友所熟知的註冊登記方式，還是以在區公所外排隊等待為主。從拉莫及丘頓的敘事，也可發現同時一起在爭奪排隊位置的，還有許多其他國家的人群。筆者目前還無法釐清為何這些新規定與實際狀況仍有相當落差（即，為何分區辦公室仍然受理排隊等待的人群）。
29. 拉莫等人的解釋是，近幾年法國的藏人增加快速，尤其是在 2015 年後，Conflans 河岸一帶搭帳篷的藏人逐漸增多，形成獨特的景觀。許多居民除主動協助部分藏人到家裡暫住，也不斷向區公所施壓，希望他們加快藏人身分審核的流程及迅速安排其居所。因此，以丘頓為例，她在身分註冊後僅等待了一個多月即收到面談通知。相關報導亦可見：http://www.assumptio.org/nouvelles.php?pLingua=ENG&id=17&vouce=Life%20of%20the%20Provinces&newsId=232&titolo=A%20Floating%20Parish%20dedicated%20to%20Welcoming%20the%20Homeless&data_loc=2015-11-25%20-%20Paris（取用日期：2020 年 11 月 30 日）。這樣的狀況雖在 2018 年底獲得解決，但許多新進藏人又重新開始在同個地方搭建起帳篷，2019 與 2020 年都不斷有這些帳篷被拆除的新聞報導（見 <https://france3-regions.francetvinfo.fr/paris-ile-de-france/yvelines/yvelines-150-demandeurs-asile-tibetains-evacues-conflans-sainte-honorine-1706194.html>，取用日期：2020 年 11 月 30 日）。
30. 關於面談後的等待時間，許多較早期（2015 年前）的申請者都是等待了好幾個月、甚至超過半年才收到通過通知，而晚近的申請者，則多半在較短時間（一、兩個月內）就收到結果通知。
31. 在筆者訪談的藏人中，直到 2020 年，僅有拉莫獲得公民身分，達娃則是已遞出公民申請，處於還在等待結果的階段。兩人申請公民時，距離獲得長期居留身分的時間都已超過 6 至 7 年。至於頓珠，則是嘗試了好幾次的語言測驗皆無法通過，拉莫除了每天與頓珠練習會話外，也開始思考是否能透過其他方式（如取得特殊職能技術資格或證書）讓頓珠有辦法符合申請公民的資格。
32. 見 <https://www.unhcr.org/en-lk/5322ca479.pdf> 與 <https://www.asylumineurope.org/rep>

[orts/country/france/content-international-protection/status-and-residence/residence-permit](https://www.service-public.fr/particuliers/vosdroits/F11926?lang=en) (取用日期：2020 年 11 月 30 日)。

33. 該資格之認定主要是在申請者雖不符合難民身分，但於原國家遭受重大威脅。
34. 不論是歐盟或是法國關於難民申請的規定與流程，都沒有針對藏人有特殊的條文或配額規定，筆者在本研究田野中所遇到的所有受訪者，也都不適用於歐洲早期（如瑞士、瑞典等國家）提供給印度特定屯墾區藏人的再安置專案計畫。他們與其他來自亞洲、中東或非洲的難民，都是以同樣的方式註冊並進入難民身分認定的流程。然而，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不論是書面審查或面談，申請人的族群身分、背景或個人經歷是否（及如何）影響第一線政策執行者的主觀判斷，甚至是否在申請結果上顯現出特定人群較容易或較難以通過的現象，本研究在目前階段實在難以獲得更具體或進一步的資訊，僅能就藏人受訪者的感受與觀點，呈現他們彼此間在日常談話中用以區別自我與其他申請者的說法。而如同本頁內文所呈現的，其中有些「比較」的說法（如，雖同為難民，但因族群身分與流亡背景的差別而影響居留年限的長短），應是帶有誤解，並非事實。
35. 筆者的一些報導人提到，2012 年之前申請法國公民相對容易，只要在面試過程中能用法語回答基本社會與生活常識（如法國國旗的意義），即可通過。但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法國政府針對六十歲以下的入籍申請增加了語言規定，要求必須出示 B1 等級的口語（聽、說）能力證明，讓許多到法國後才開始學習法語的藏人望之卻步，不少人在經歷幾次語言檢定失敗後便放棄。這樣的語言規定自 2020 年 8 月 11 日起又更趨嚴格，入籍法國公民的語言規範再加入了寫作項目，並取消年齡限制，即，所有欲申請公民者，不論年齡，都必須提出法語 B1 等級（含）以上的口語及書寫能力證明（<https://www.service-public.fr/particuliers/vosdroits/F11926?lang=en>，取用日期：2021 年 1 月 30 日）。這讓許多已在好幾次語言測驗中受挫的藏人（如頓珠），覺得公民身分更加遙遙無期。
36. 如本文中的諾拉，由於覺得自己永遠都不可能通過語言測驗，開始尋求到其他英語系國家念書的機會。除此，筆者在 2018 年遇到的一位藏人，已在法國居住超過五年，由於年紀較大（五十多歲），雖透過自學可以用基礎的英語進行對話，但還是無法以法語進行日常溝通，這也使其在法國的生活陷入困境。筆者在後續的田野得知，該位藏人已透過婚姻移民去了某個英語系國家。
37. 這個獲得「單獨房間」的階段，會因藏人難民進入法國的時間先後而有不同。例如，

較早期（多在 2010 年前）到法國者，許多人在等待身分面試的過程中，即獲得了暫時安身的房間；然而，這些人身分等待的時間也較長，許多人因此在等待過程中即會開始尋找打工機會。而在近幾年到法國的藏人，雖然身分申請的進展較快速，但因難民人數過多，許多人在面試通過後，仍在河邊的帳篷等待住所分配。

38. 此處所指的「生活」，是在與受訪者的對談與觀察中發現的，有時展現於「我的住所」（“my place”）的用詞中，有時則是呈現在較為規律、放鬆的生活狀態，以及充滿「未來規劃」的討論與願景想像的談話裡。
39. 在學齡階段流亡至印度的藏人，若無居住在各地屯墾區的親屬，多數會被安排進入北印度 Dharamsala 的學校（如 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 TCV）就讀，許多人在完成學業前的生活起居，就是以學校及宿舍為核心。
40. 達娃認為在印度，藏人如不好好念書、在流亡政府或屯墾區辦公室找到工作，幾乎等於沒有未來。另外，她也強調，即使在上述這些地方找到工作，薪水也非常微薄，可能僅能養活自己，更別說提供父母更多的經濟支持，或有餘裕改善自己的生活。達娃的兒子對足球有興趣，因此她也計劃在寒、暑假時讓他參加相關營隊，希望他在未來的生涯規劃有更多選擇。
41. 如本文在下節將提及的，部分藏人雖認為移居後的物質生活比在印度時好，孩子也因為在法國受教育及有機會獲得明確的公民身分，而更有「未來」，但他們也相當憂心藏語及藏人的文化與宗教傳統會在下一代逐漸消失，尤其，在法國的第二代因為不是成長於藏人聚居的環境，藏語能力相對薄弱，對自己的文化及宗教傳統也多非常陌生。這樣的擔憂顯現出許多移居藏人對「更好」生活的詮釋與追求，事實上是建立在許多面向的取捨與不斷協商的過程中。
42. 如拉莫好幾次向筆者提到，若可重新選擇，她會尋找機會去美國，而不是法國，因為在美國使用英語即可生活，且她根據其他家人及朋友在美國的經驗，認為美國比法國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也因此，她雖然已獲得法國的公民身分，但一直沒有放棄前往美國的計畫，不時提到之後可能送孩子到美國念書，或自己與頓珠想辦法先到美國找工作，再將全家移民過去。
43. 巴登原先申請難民庇護的國家是比利時，但並不順利。他在遭到拒絕後才又輾轉來到巴黎。由於他在比利時註冊時已按壓指紋，紀錄上顯示法國並非他第一個抵達的國家，讓他在法國的申請相較其他同時遞件的藏人緩慢。除了巴登，與拉莫一起上法語進階班的一位藏人同學，則是從瑞士再來到法國，這位年紀二十初的女孩因為

表姊在瑞士，一開始選擇去了瑞士，但因瑞士的難民身分認定在近幾年愈趨嚴格，她在那裡等待了三年，申請進度都沒有進展，看到先前一起來到歐洲的友人在法國已獲得居留身分並開始工作，她才決定轉往法國。筆者進行田野時，她已通過面試，正在等待居留證件。由於她在瑞士已經學習了三年法語，相較於拉莫等人法語相當流利，加上年紀較小，獲得居留證後她將可申請進入法國的大學就讀。

44. 由於住在「船屋」與河邊帳篷區的難民幾乎都為藏人，巴登在講述中是以「藏人」為主體，不清楚這個遷移與安置的過程是否也包含暫居在街頭其他族群的難民。
45. 初到法國的藏人，由於語言的困難，有些會在相互引介下，到中國餐館或中國旅館工作，工作內容通常以房間清潔、床被單的清洗，與廚房打雜等為主。有些人（如拉莫與頓珠）則是會透過社工尋找工作機會，工作性質也多與較不需要語言對話的打掃與清潔有關，或是到郊外的種植園工作。
46. 頓珠當時也在同間飯店的不同廠區工作。不同於達娃，頓珠當時是以一個星期為週期交替輪流日、夜班，而這樣的工作型態也影響了頓珠家庭的日常作息，如，在頓珠上日班的那一週，拉莫每日的晚餐時間通常是在頓珠回家後的九點多、甚至十點才開始。而在頓珠上夜班的那個星期，家人們不但常因他半夜起床受到影響，拉莫也必須在早上獨自將孩子們分別送到各自的學校（田野筆記，2018年1至2月）。
47. 在大巴黎區的藏人間，有一個與工作訊息相關的 WeChat 群組，需要尋找工作或有工作機會分享者，都會透過該群組發布資訊。然而，許多不會中文的藏人，即使透過藏人網絡的分享得知中國餐廳或旅館有工作機會，卻常因條件之一是要會講中文而無法應徵。
48. 相較於大人們圍繞在主要餐桌旁吃飯，貝瑪、達娃與拉莫的小孩則是坐在旁邊另外一桌，但他們彼此間以法語交談的對話，常會引起大人們的注意，時不時以交雜著藏、法語的方式出聲回應。
49. 宗派的網絡關係對僧侶身分的藏人難民尤其重要，各教派在法國及歐洲各地的宗教中心，常成為僧侶們安身工作之處。除此，當各教派的重要領袖或僧侶自印度、尼泊爾到法國進行講經時，在法的藏人（僧侶及非僧侶之信眾）也多會前往，許多藏人即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與同住在法國的同教派信仰者建立或持續深化原有的關係連結。
50. 田野筆記，2016年7月19日。

51. 田野筆記，2018 年 8 月 5 日。
52. 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穆斯林女性，有些是跟隨丈夫來到法國，有些則是為了逃離家中安排的婚姻，有人藉由剪掉長髮、染髮、畫上多彩絢麗的眼影妝容，以及強調不會再戴上頭巾，來顯示自己與原生社會文化的切割，有人則呈現出到法國後仍無法擺脫來自家庭或社群的壓力（田野筆記，2018 年 7 至 8 月）。
53. 田野筆記，2018 年 2 月 1 日。
54. 筆者有次隨達娃等人出去時，就曾在地鐵遇到一個講著藏語的年輕人，他聽到達娃等人以藏語對話，就湊過來攀談。短暫的對話中得知他成長於印度，正在一家中國餐館工作，但不會中文的他，在工作中遇到相當多挫折與怨氣。他在談話中幾次談到，中國人對待藏人的態度很差，給「他們」（對話中為「我們」）相當多的工作量，要不是因為有好友一起，他實在很想辭職。談話中他也幾次詢問達娃，是否知道哪裡有工作機會，可以介紹給他，兩人最後互留了通訊方式。
55. 然而他似乎還是無法理解自己為何可以同時是藏人與法國人，筆者拜訪期間，就至少聽到兩次小孩詢問同樣的問題。
56. 在拜訪各家戶時，筆者也觀察到，即使大部分的藏人家中都還延續著文化宗教相關的擺置（如唐卡、教派的主要仁波切像）與日常實踐（如供桌的供奉、經文念誦等），但多數父母都不大會要求孩子跟著做，或解釋這些擺置與行為的意義。筆者在 2019 年初拜訪印度時，與曾在藏人學校（Central School for Tibetans, CST）擔任宗教老師的僧侶提到這個觀察，並詢問是否有在國外出生的藏人孩子暑假時被送到寺院學習自己的宗教文化。那位僧侶表示還未見到，但他也指出，在藏人傳統中，家戶日常的祭儀與實踐都是在耳濡目染下逐漸學習的，父母通常不會特意向孩子解釋或說明（多數父母也會認為自己無法清楚解釋），教授宗教相關知識的通常是寺院。然而，在流亡的環境中，達賴喇嘛等宗教領袖也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在印度，藏人行政中央鼓勵各學校設置宗教老師，達賴喇嘛也多次提到學校的學生以及非僧侶的信仰者（lay people），都需要學習自己的宗教傳統，並透過辯論（debate）理解宗教知識對各現象的解釋及邏輯，這些都是希望把過去只限制在寺院的宗教知識，推廣到非僧侶的藏人大眾間（田野筆記，2019 年 2 月 7 日）。
57. 為避免揭露該名對話者，筆者在此處對其身分細節做了較多模糊化的處理，但完整保留其在對話中所指出的藏人身分在中國之處境。筆者與卓瑪，因為共同認識的友人而在幾年前曾見過幾次面。

58. 或許是因為這樣，許多在青、壯年階段離開中國的藏人難民，多是還未成家的單身者或是寺廟僧侶。
59. 除了卓瑪，筆者在許多國際活動場合遇到的藏人，也都曾提及在中國的藏人申請出國許可的困境，如許多時候即使出國行程已被批准，允許離境的期限也都非常短，於公務行程或研討會結束後，就必須馬上返回中國。除此，很多人即使已獲得出境許可，在到了機場準備搭機時，還是會被攔下取消出境許可，筆者參與的幾次國際藏學年會中，就常有在最後一刻被取消出境而無法出席的藏人參與者。至於出國探親，筆者還未聽到在中國有藏人是以這個理由獲得准許出國的。
60. 如前文所述，在印度的藏人多持有印度核發的居留證（RC），需要離開印度進行國際移動者，則會申請由印度政府核發的旅行證件（IC），由於 IC 不屬於一般的國家護照，藏人在申請簽證時往往會比一般護照更加困難，且在進行跨國移動時，也常會因海關沒見過這樣的證件或無法理解他們屬於哪個國家，而遭遇許多盤查與詢問。
61. 藏人以難民身份在法國取得居留權後，若要離開歐盟國家進行跨國移動，須申請旅行文件（titre de voyage pour les étrangers），一次效期為五年（見 <https://www.service-public.fr/particuliers/vosdroits/F15401>，取用日期：2021 年 1 月 30 日）。
62. 如達娃就曾提及：「我們（藏人）在這裡（法國）有未來；在印度沒有未來」（“We [Tibetan refugees] have future here [in France]. There was no future [for Tibetans] in India.”）（田野筆記，2018 年 8 月 6 日）。
63. 在印度，作為流亡者與「難民」的敘事雖然在學校教育（透過課本內容、國歌與歌曲、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等）、特定節慶場合（如拉薩起義紀念日、達賴喇嘛生日的慶典等）的演講與展演中，不斷為藏人居住在印度的生活及身分處境提供解釋與意義，也常出現在藏人們與外來者（如筆者或其他外國人）的對談中，但多數時候，藏人在屯墾區的日常生活裡，並不需要不斷確認或表述自己作為流亡者的過程與身分。
64. 其身分證件上的國籍欄，會從原先的「中國難民」轉而成為「法國人」。在藏人難民獲得的居留證上，除了顯示姓名、出生年月日，還會有出生地（會顯示申請人填寫的出生城市及國家）以及國籍（呈現方式為「Refugie Chinois」，指來自中國的難民）。而當他們獲得法國公民身分後，身分證件上的出生地則僅會呈現城市（不會顯示該城市所在的國家），國籍部分則會顯示 Française（法國人）。

65. 筆者當時詢問達娃在巴黎的流亡政府辦事處 (Bureau du Tibet Paris) 可否提供在法的藏人難民一些生活上的協助，達娃回答的原話如下：「藏人辦事處沒有用，我們從來不會將希望寄託在他們。但是藏人 (指一同在進行難民庇護申請的藏人) 會相互幫忙」 (“Tibetan Bureau is useless, we never put our hope on them. But Tibetans will help each other.”) (田野筆記，2018 年 8 月 6 日)。
66. 印度政府對待近幾年進入印度的新進流亡者，在身分證件的核發與居留許可上皆較為嚴苛。首先，在 1980 年代之後，印度原則上已不再核發給新進藏人居留證件 (RC)，少數透過教育或朝聖取得居留許可者，皆有效期限限制，部分藏人因此必須透過購買獲得較長期的居留證件。而針對已在印度居住超過二十年或出生於印度之藏人，印度政府自 2012 年起，將其申辦的居留期限從 1 至 2 年延長至 5 年，並簡化其每次申辦再延期的程序 (見 Liu 2018)。
67. 對出生在印度屯墾區的藏人而言，屯墾區是他們出生及成長的地方，雖然在印度的客居身分無法被改變，但屯墾區仍然是最熟悉的家 (Liu 2012)。這樣的感受有時會成為生長於屯墾區之藏人藉以區別來自中國藏區者的原因，認為他們不屬於屯墾區。除此，許多年紀較大才自中國移居至印度的藏人，雖然在生活過程中也學會一些北印地語，但除了口音濃厚，其口語及讀寫能力多半遠不如在印度出生及長大者。筆者在印度的田野中，就有幾次觀察到在印度或尼泊爾出生的藏人，彼此間有時的對話會刻意轉換成 Hindi，將來自中國藏區、無法聽懂的藏人區隔於外。雖然這樣的時刻不多，但已顯現出藏人內部的背景差異，有時會在印度的生活與互動過程裡被進一步凸顯或放大。
68. 筆者在印度的田野中，也曾聽到一些在印度出生、長大者，形容自中國藏區來到印度的藏人脾氣較不好，容易與人產生衝突，有人甚至認為由於 Dharamsala 有較多來自中國的藏人，是造成當地印度居民常與藏人發生衝突的原因。
69. 除了日常生活的互動，在許多宗教活動與節日慶典中，如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到訪巴黎的活動、藏曆年的慶祝聚會，以及每年 3 月 10 日紀念拉薩起義在巴黎街頭舉行的遊行活動，也可觀察到來自不同地方的藏人，透過參與，以及不斷重述、展演自我族群身分的過程，逐漸形成以法國社會情境脈絡為基礎的共同感經驗。
70. 以苯教為例，當 2018 年 10 月尼泊爾加德滿都苯教寺院的 Yongdzin 仁波切在法國南部的宗教中心 Shenten Dargye Ling 舉行祈福法會時，或如 2019 年 6 月北印度苯教曼日寺院的新任住持到訪南法時，許多以難民身分旅居法國的苯教藏人，都特別

從巴黎趕到南法去參加，許多人也在儀式會場遇到了以前在中國、印度或尼泊爾同村落的友人，才發現各自都到了法國。

71. 雖如此，但筆者也觀察到，在近十多年來以「難民」身分在法國居留的藏人們，與更早時期（1950 至 80 年代）來到法國的藏人及他們的下一代，或是因就學、工作與婚姻（另一半不是藏人）來到法國者，彼此間的關係互動似乎並不緊密，根據拉莫等人的說法，他們與那些更早來到法國、「早已成為法國人」的藏人們，僅在藏曆年聚會或教派的活動時會遇到，平時的生活並沒有太多交集。
72. 該段對話摘錄自筆者較早期在印度的田野紀錄。
73. 如，「他已在德國取得（身分）文件」（“He got the papers in Germany.”）或「她已經有美國綠卡／護照」（“She has American green card / passport now.”）等。
74. Yeh（2007）針對經由不同路徑進入美國的藏人有許多深刻且細微的觀察，她並指出，成長環境、語言語調與生活慣習等日常互動中可感受的差異，常在移居藏人間產生各種關於藏人性的論辯（如，誰是「真正的藏人」）。對此，筆者受訪者中的確有人曾在談話裡以「真的藏人」（“real Tibetan”）稱呼他們所遇到的來自中國、講話帶著濃重方言口音的藏人，在該語境中，這樣的稱呼雖表達了那些人出生且成長於西藏，在土地連結上更趨近於「西藏人」的意涵，卻並不表示這些受訪者否定自己的藏人性，或認為土地連結是藏人性的唯一表現（如，他們有時也會以「中國人」描述來自中國藏區者的一些習慣與行為）。而至少在本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筆者還未觀察到這樣的區分成為藏人間論辯的話題。另一方面，筆者認為移居藏人在法國面臨的處境與 Yeh 所探討的美國也稍有不同，除了語言環境的差異，進入法國或美國後面對體制的身分（如婚姻移民、工作或就學居留，以及申請難民庇護者）也可能在藏人間造成認同表述與互動的差別。本研究僅聚焦近期在法國申請難民庇護者，即，在一開始已劃定了具某種同質身分的主體範疇，因而較難觀察到不同居留身分的藏人間相處與互動的過程，對此，筆者希望未來能延伸視角至更多樣身分的藏人，也期待能從更細微且多層面的互動理解「藏人性」的表述過程與意義。

參考書目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

2003 《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臺北：聯經。

劉堉珊

2016a 〈印度流亡藏人苯教信仰者的邊緣化處境與生存策略〉。《考古人類學刊》84：145-190。DOI: 10.6152/jaa.2016.06.0005

2016b 〈「難民」身分的意義轉變：法國藏人家庭田野紀實〉。「芭樂人類學」，<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537>，2016年8月22日上線。

潘美玲

2013 〈流亡藏人的公民身分政治〉。「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02年學術研討會－亞洲之南文化研究與科技社會」宣讀論文，國立交通大學，11月29日。

2016 〈錯置的離散：臺藏家庭的在臺境遇〉。《臺灣人權學刊》3(4)：69-89。

Anand, Dibyesh

2000 (Re)imaging Nationalism: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of South Asia.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9(3): 271-287. DOI: 10.1080/713658756

Anderson, Benedict

1991[1983]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arth, Fredrik

2000 *Boundaries and Connections*. In *Signifying Identiti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Boundaries and Contested Values*. Anthony P. Cohen, ed. Pp. 17-36. London: Routledge.

Brettell, Caroline

- 2003 *Anthropology and Migration: Essays on Trans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Identity*.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Cech, Krystyna

- 1987 *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Identity of the Tibetan Bonpo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North-West Himalayan Settlement*. Ph.D. dissertation, Linacre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 1993 *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Identity of the Tibetan Bonpos*. In *Anthropology of Tibet and the Himalaya*. Charles Ramble and Martin Brauen, eds. Pp. 39-48. Zurich: Ethnological Museum of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Chang, Wen-chin

- 2014 *Beyond Borders: Stori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grants of Burm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hoedup, Namgyal

- 2015 *From Tibetan Refugees to Transmigrants: Negotiating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Economic Mobility through Migratio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Clifford, James

- 1994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3): 302-338.
DOI: 10.1525/can.1994.9.3.02a00040

Cohen, Robin

- 1996 *Diasporas and the Nation-State: From Victims to Challeng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72(3): 507-520. DOI: 10.2307/2625554

Conway, John S.

- 1975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Exile*. *Pacific Affairs* 48(1): 74-86.
DOI: 10.2307/2755449

Das, Veena, and Deborah Poole

- 2004 *Anthropology in the Margins of the State*.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Diehl, Keila

1997 When Tibetan Refugees Rock, Paradigm Roll: Echoes from Dharamsala's Musical Soundscape. *In* Constructing Tibetan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Frank J. Korom, ed. Pp. 122-159. Quebec: World Heritage Press.

2002 Echoes from Dharamsala: Music in the Life of a Tibetan Refugee Commun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OI: 10.1525/9780520936003

Douglas, Mary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Dreyfus, Georges

2002 Tibetan Religious Nationalism: Western Fantasy or Empowering Vision. *In* Tibet, Self, and the Tibetan Diaspora: Voices of Difference. P. Christiaan Klieger, ed. Pp. 37-56. Leiden, Boston and Köln: Brill 2/8.

Falcone, Jessica, and Tsering Wangchuk

2008 "We're Not Home":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dia Review* 7(3): 164-199. DOI: 10.1080/14736480802261459

Frechette, Ann

2002 Tibetans in Nepal: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mong a Community in Exil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Fuglerud, Øivind

1999 Life on the Outside: The Tamil Diaspora and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DOI: 10.2307/j.ctt18dzs5h

Geertz, Clifford

1995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hosh, Partha S.

2016 *Migrants, Refugees and the Stateless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SAGE.

Gladney, Dru C., ed.

1998 *Making Majorities: Constituting the Nation in Japan, Korea, China, Malaysia, Fiji,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en, Sahra F.

2005 *Notes from the Balkans: Locating Marginality and Ambiguity on the Greek-Albanian B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yaltag, Gyaltsen

2003 *Exiled Tibetan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Susanne Martin, trans. *In Exiled as Challenge: The Tibetan Diaspora*. Dagmar Bernstorff and Hubertus von Welck, eds. Pp. 244-265.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Harrell-Bond, Barbara E., and Eftihia Voutira

1992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Refugees*. *Anthropology Today* 8(4): 6-10.
DOI: 10.2307/2783530

Harris, Clare

1997 *Struggling with Shangri-La: A Tibetan Artist in Exile*. *In Constructing Tibetan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Frank J. Korom, ed. Pp. 160-177. Quebec: World Heritage Press.

Hess, Julia Meredith

2009 *Immigrant Ambassadors: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1126/stanford/9780804760171.001.0001

Houston, Serin, and Richard Wright

2003 *Making and Remaking Tibetan Diasporic Identities*.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4(2): 217-232. DOI: 10.1080/14649360309062

Ishikawa, Noboru

- 2010 *Between Frontiers: Nation and Identity in a Southeast Asian Borderland*.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Jayal, Niraja. G.

- 2013 *Citizenship and Its Discontents: An Indian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4159/harvard.9780674067585

Kolas, Ashild

- 1996 Tibetan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3(1): 51-66. DOI: 10.1177/0022343396033001004

Liu, Yu-shan

- 2012 *A Minority within a Minority: Being Bonpo in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Exil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2014 Rethinking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Bon/Zhangzhung Traditions: The Case of Yungdrung Shon Dance (g.yung drung shon rtsed). *In Current Issues and Progress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Young Tibetologists, Kobe 2012* (Journal of Research Institute 51). Tsuguhito Takeuchi, Kazushi Iwao, Ai Nishida, Seiji Kumagai, and Meishi Yamamoto, eds. Pp. 271-289. Kobe: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2015 Schooling and Politics: Textbook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Tibetan Schools in India.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23(4): 456-478.
DOI: 10.1080/09584935.2015.1090949
- 2018 Refugee Policies and Identity Politics: The Cases of Tibetan Communities in Exi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th East Asian Regional Conference in Alternative Geography (EARCAG), Daegu, December 13.

Malkki, Liisa H.

- 1992 National Geographic: Rooting of People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cholars and Refuge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7(1): 24-44.
DOI: 10.1525/can.1992.7.1.02a00030

- 1995a Purity and Exile: Violence, Memory, and National Cosmology among Hutu Refugees in Tanzani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I: 10.7208/chicago/9780226190969.001.0001
- 1995b Refugees and Exile: From “Refugee Studies” to the National Order of Thing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495-523.
DOI: 10.1146/annurev.an.24.100195.002431
- Matsuoka, Atsuko, and John Sorenson
- 2001 Ghosts and Shadows: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Community in an African Diaspor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DOI: 10.3138/9781442675322
- McConnell, Fiona
- 2011 A State within a State? Explor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ian State and the Tibetan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in-exile.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19(3): 297-313. DOI: 10.1080/09584935.2011.594160
- 2013 Citizens and Refugees: Constructing and Negotiating Tibetan Identities in Exil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3(4): 967-983.
DOI: 10.1080/00045608.2011.628245
- McGranahan, Carole
- 2016 Refusal and the Gift of Citizenship.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3): 334-341.
DOI: 10.14506/ca31.3.03
- 2018 Refusal as Political Practice: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Tibetan Refugee Status. *American Ethnologist* 45(3): 367-379. DOI: 10.1111/amet.12671
- Michael, Franz
- 1985 Survival of a Culture: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Asian Survey* 25(7): 737-744.
DOI: 10.1525/as.1985.25.7.01p02877
- Mishra, Mallica
- 2014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Education, Culture and Growing Up in Exile. New Delhi: Orient BlackSwan.

Mills, Martin A.

- 2006 The Silence in Between: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Academic Voice in Tibetan Diaspora Studies. *In Critical Journey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ists*. Geert De Neve and Maya Unnithan-Kumar, eds. Pp. 191-206. Farnham: Ashgate.
DOI: 10.4324/9781315575032-11

Nowak, Margaret

- 1984 Tibetan Refugees: Youth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eaning.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abinowitz, Dan

- 2001 The Palestinian Citizens of Israel, the Concept of Trapped Minority and the Discourse of Transnationalism in Anthropolog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1): 64-85. DOI: 10.1080/014198701750052505

Rosaldo, Renato, ed.

- 2003 Cultural Citizenship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OI: 10.1525/california/9780520227477.001.0001

Sa'ar, Amalia

- 1998 Carefully on the Margins: Christian Palestinians in Haifa between Nation and State. *American Ethnologist* 25(2): 215-239. DOI: 10.1525/ae.1998.25.2.215

Sharma, Maina

- 2009 Refugees in Delhi. New Delhi: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Swank, Heidi

- 2014 Rewriting Shangri-La: Tibetan Youth, Migrations and Literacies in McLeod Ganj, India.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DOI: 10.1163/9789004263901

Tethong, Wangpo

- 2003 Young Tibetans in Europe. Susanne Martin, trans. *In Exiled as Challenge: The Tibetan Diaspora*. Dagmar Bernstorff and Hubertus von Welck, eds. Pp. 409-418.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Thapan, Meenakshi

- 2016 'Single' and Alone: Tibetan Youth in Exile in India. *Society and Culture in South Asia* 2(2): 161-181. DOI: 10.1177/2393861716643875

Tibet Justice Center

- 2016 Tibet's Stateless Nationals III: The Status of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bu.edu/law/files/2016/09/Tibets-Stateless-Nationals-II-FINAL-report.pdf>,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0.

Tsing, Anna Lowenhaupt

- 2000 The Global Situ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5(3): 327-360.
DOI: 10.1525/can.2000.15.3.327

Venturino, Steven

- 1997 Reading Negotiations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In Constructing Tibetan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Frank J. Korom, ed. Pp. 98-121. Quebec: World Heritage Press.

Yeh, Emily T.

- 2007 Exile Meets Homeland: Politics, Performance,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5: 648-667.
DOI: 10.1068/d2805

